

中共党史
重点问题答疑



中共党史重点问题答疑

郑德荣 朱 阳 主编
孙友葵 郭永钧 编
任永祥 宋 春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5年 哈尔滨

责任编辑：遇秀伟

封面设计：孟晓柯

中共党史重点问题答疑

Zhonggongdangshi Zhongdian Wenti DaYi

郑德荣 朱 阳 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区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印张 78/16 字数 141,000

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5,500

统一书号： 3093·305 定价：1.05元

说 明

我们所编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上、下册)系教育部推荐供高等学校文科选用教材。近年来,又被吉林、广西等省、自治区高等教育考试委员会定为自学教材。为了帮助广大读者重点掌握和深入理解中共党史的基本内容,结合读者在学习经常提出的问题,我们在所编《讲义》的基础上,写出《中共党史重点问题答疑》一书,就六十八个问题作了理论的分析,历史的概括,注意史论结合,力求完整准确。同时,对五十一个主要历史事件、党的重大方针政策,作了简明的阐释,附录于后。

本书的编写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遵照教育部新修订的《中共党史教学大纲》的要求,并吸收了近年来党史学界研究的新成果。书中不当和错漏之处,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是由东北师范大学政治系和马列主义教研部部分同志参加编写的。其分工是: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由孙友葵执笔;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郑德荣执笔;抗日战争时期,由郭永钧执笔;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由朱阳执笔;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由任永祥执笔;开始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时期，由任永祥、孙友葵执笔；“文化大革命”时期，由孙友葵、宋春执笔；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和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时期，由宋春执笔。由郑德荣、朱阳定稿，郭永钧参加了统稿工作。

编 者

一九八四年四月

目 录

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

- 一、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1
- 二、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
经过及其重大意义3
- 三、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5
- 四、党的“三大”为什么确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 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是什么?.....8
- 五、党和毛泽东同志是怎样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10
- 六、举行北伐战争及迅速取得胜利的原因.....13
- 七、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是怎样论述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运动问题的?有何重大意义?14
- 八、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标志、错误的主要内容及其危害.....16
- 九、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及其经验教训.....19

附 录

〔新文化运动〕	21
〔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三次论战〕	21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23
〔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24
〔二七惨案〕	25
〔国民党“一大”〕	25
〔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26
〔五卅运动〕	26
〔中山舰事件〕	27
〔整理党务案〕	28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28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29
〔马日事变〕	30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30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十、蒋介石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性质、特点及其对内对外政策	31
十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内容和历史意义	34
十二、古田会议的主要内容和历史意义	36
十三、中国革命为什么必须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38
十四、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路线的形成过程、	

基本内容及其重大意义	41
十五、毛泽东关于中国工农红军的 基本作战原则	43
十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主要 错误及其危害	45
十七、为什么说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 关的转折点？	48
十八、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 告的基本内容和意义	51
十九、中国共产党为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进行 了哪些斗争？	53
二十、怎样理解毛泽东思想是在同国际及我们 党内教条主义错误倾向的斗争中，逐步 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56

附 录

〔南昌起义〕	61
〔湘赣秋收起义〕	62
〔广州起义〕	62
〔九一八事变〕	63
〔福建事变〕	63
〔一二九运动〕	64

抗日战争时期

二十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特点 及其重大意义	66
二十二、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两条不同抗战	

指导路线的内容、根本分歧 及其实质·····	68
二十三、为什么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 利是中国的？·····	69
二十四、党为什么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 的独立自主原则？怎样坚持 这一原则？·····	70
二十五、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主要错误、根源 及其危害·····	72
二十六、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是 怎样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基本规律的？·····	73
二十七、怎样理解毛泽东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 达到成熟？·····	76
二十八、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总方 针及其对顽固派斗争的原则·····	78
二十九、整风运动的内容、方针及其 重大意义·····	79
三十、为什么说党的“七大”是我党在民主革 命时期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	81
三十一、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经验及其 伟大意义·····	82
附 录	
〔芦沟桥事变〕·····	84
〔洛川会议〕·····	84

〔平型关大捷〕·····	85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85
〔第一次反共高潮的被击退〕·····	86
〔百团大战〕·····	87
〔皖南事变〕·····	87
〔大生产运动〕·····	89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三十二、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和党的方针、斗争策略·····	90
三十三、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为什么要争取和平民主？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的主要内容和意义是什么？·····	94
三十四、怎样理解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党关于粉碎国民党军事进攻的政治方针和军事原则是什么？·····	98
三十五、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哪些爱国民主运动？我党是怎样领导白区工作和地下斗争的？·····	102
三十六、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经济纲领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106
三十七、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是怎样开展的？党是怎样论述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以及纠正土改工作中“左”倾错误的？·····	108
三十八、一九四九年初，我党为什么提出“将	

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一九四九年	
国共和平谈判的经过和意义是什么？……	112
三十九、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主要内容	
及其意义 ……………	115
四十、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的主要内容	
及其意义 ……………	118
四十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	
和伟大意义 ……………	121

附 录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 ……………	123
〔停战协定〕 ……………	124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	124
〔一九四七年党的十二月会议〕 ……………	125
〔一九四七年的整党整军运动〕 ……………	125
〔三大战役〕 ……………	126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四十二、党是怎样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从新民主	
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	128
四十三、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主要内容	
及其意义 ……………	131
四十四、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成就	
和基本经验 ……………	133
四十五、为什么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反映	
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136
四十六、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经验	

及其意义	139
四十七、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 基本经验及其意义	141
四十八、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是怎样提出 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 建设道路的?	143
四十九、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历史功绩 及其意义	145

附 录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五大运动〕	148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51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	151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52
〔一九五六年一月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152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五 十、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问题》的主要内容和重大意义	153
五十一、怎样正确认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	155
五十二、“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出现的 原因和教训	157
五十三、“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提 出、实施及意义	159
五十四、一九六二年初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的 工作会议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162
五十五、为什么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成就是主要的？有哪些经验教训	166
----------------	-----

附 录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171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171
〔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	172
〔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	172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	173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73

“文化大革命”时期

五十六、“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及其 错误性质	175
五十七、为什么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	179
五十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化 大革命”中的罪行	181
五十九、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和人民同林彪、 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哪些斗争？	185
六十、“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191
六十一、如何理解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 中的错误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所犯的错误	193

附 录

〔《五·一六通知》〕	196
〔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197
〔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	198

历史的伟大转折时期

- 六十二、为什么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党的
工作在徘徊中前进?.....198
- 六十三、为什么说“两个凡是”的方针是错误的?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有何
重大意义?.....200
- 六十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内容和
伟大意义203
- 六十五、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主要内容和
伟大意义207
- 六十六、《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基本内
容及其伟大指导作用是怎样阐述的?.....210
- 六十七、《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对适合我国情况的现代化建设
道路的主要内容是怎样阐述的?.....212

附 录

- 〔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214
- 〔四项基本原则〕215
-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215

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时期

- 六十八、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伟大功绩217

附 录

- 〔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223

党的创立和第一次 大革命时期

一、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 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是中国近代社会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从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是：①封建剥削和帝国主义买办资本、高利贷资本结合在一起，占显著的优势；②民族资本主义有某些发展，但很微弱；③帝国主义控制着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命脉。帝国主义以封建主义为基础，封建主义以帝国主义为靠山，它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残酷地压榨中国人民，严重地阻碍着中国政治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矛盾。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就成为近代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

（二）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原因及经验教训

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中国人民进行了七十多年的英勇斗争。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是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和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特别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表现了中国人民顽强的反抗精神。但是，所有这些斗争都失败了。

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原因：在客观上，由于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的力量，大大超过了革命的力量；在主观上，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提不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也不懂得发动广大工农群众，依靠人民革命力量去夺取胜利。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历史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都不能找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出路，都不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中国革命迫切需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兴的工人阶级（通过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革命的政党）来领导。这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便历史地落在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了。

（三）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工人阶级是在鸦片战争后，伴随着外国资本在华企

业、中国早期官办企业和民族资本企业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并逐渐成长壮大起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到一九一九年已发展到二百万人左右。

中国无产阶级除具有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自己特殊的优点：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革命最坚决、最彻底；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大企业里，便于团结战斗，易于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大都来自破产的农民，与农民有天然联系，便于结成工农联盟。

中国工人阶级从产生那天起，就不断进行着反抗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斗争。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一八年，有记载的罢工就有六十八次。这些斗争显示了无产阶级坚强的革命精神，但这时无产阶级处于自在阶级状态，这些斗争属自发斗争，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以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桥梁，开始在中国传播，并逐步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于是，中国共产党便应运而生了。可见，中国共产党正是应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 经过及其重大意义

（一）爆发原因

五四运动，是在中国民族灾难空前深重的情况下，在俄

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发生的伟大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加紧侵略和北洋军阀政府对内残酷压迫人民，对外妥协投降政策所造成的民族危机。

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一九一九年一月，美、英、法、日、意等国在巴黎召开了分赃会议，即“巴黎和会”。会议拒绝了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代表提出的关于恢复中国主权的请求，决定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各项特权。消息传到国内，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线。

（二）经过

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三千余人在天安门前汇集，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废止二十一条”等口号，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北洋军阀政府派出军警镇压，逮捕三十二人。第二天，北京市学生举行总罢课，以示反抗。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纷纷响应。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积极领导和组织了这次运动。李大钊及时地向人民群众提出了“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三大政治主张，给运动指明了方向。

六月三日开始，运动进入了以工人阶级为主体、以上海为中心、发展到二十多省一百五十多个城市的广大群众性爱国运动的新阶段，在广大群众反帝爱国运动的压力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下令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并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

四运动取得了胜利。

（三）历史意义

1. 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民主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2. 五四运动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五四运动当时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指导了这个伟大的爱国运动。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并显示了强大的战斗力，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已经有力量担负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

3.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三、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一）工人运动与马列主义理论二者必须结合

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产生，都必须具备工人运动和马列主义理论这两个条件，而且二者必须结合。

1.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继承人类优秀文化遗产、总结工人运动经验基础上创造的关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只有把它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才能找到实现这一真理的伟大物质力量，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伟大作用。

2. 工人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最革命的阶级，但工人

阶级的自发斗争不可能产生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只能产生工联主义意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只能由有产阶级中个别的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创造出来，从外部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这样，才能使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使工人运动由自发阶段上升为自觉阶段。

（二）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

1. 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成长壮大是党产生的阶级基础。

中国工人阶级是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在华企业、中国早期官办企业和民族资本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并逐渐成长壮大起来的，五四运动前夕已发展到二百万人。它除了一般工人阶级的基本优点外，还具有身受三重压迫革命最坚决彻底，分布集中便于团结战斗，与农民有天然联系便于结成工农联盟的三大特殊优点。初期工人运动带有自发的性质，迫切需要马克思理论作指导，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基础。

2.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党产生的思想基础。

（1）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人民找到了争取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

（2）十月革命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学习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到必须用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认为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中国的出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庶民的胜利》就是他当时的代表作。在他们带领下，中国涌现出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以他们为桥梁，马克思列宁主义得

以广泛传播。

3. 五四运动和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1) 通过五四运动，使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力量，工人阶级也意识到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必要，五四运动促进了两者的结合。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的传播，并开始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在这一结合中，迅速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为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

(2) 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初步结合在组织上的体现。一九二〇年八月，陈独秀、李达等人在上海建立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随后北京、武汉、济南、长沙、广州等地及法国、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相继成立了小组。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通过出版通俗刊物、开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会等形式，更自觉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明确地提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为党的成立进一步奠定了组织基础。

4.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第一个党纲，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中国革命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可见，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四、党的“三大”为什么确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 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是什么？

（一）我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一九二三年六月，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三大”的中心任务是，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加速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建立，以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大会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决定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同国民党合作，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同时强调共产党应保持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独立性。

1. 国共合作的必要性

（1）“三大”在正确地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国民革命，党的中心工作是致力于国民革命运动，而中国革命面临的敌人异常强大，封建主义在强大的帝国主义支持下，掌握着庞大的国家机器，而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力量还很弱小，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单靠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可能的，“二七惨案”的教训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必须联合各革命阶级，组成革命统一战线。

（2）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及其前身同盟会，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组织，曾长期进行过反对清王朝和北洋军阀的斗争，

在群众中有很大大影响，是一面易于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的民主革命的旗帜。我党与国民党合作，既能团结资产阶级民主派，又能通过统一战线发动和组织广大工农群众参加民主革命，有利于团结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促进革命事业的发展。

2. 国共合作的可能性

(1)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不仅工人、农民无法生存，小资产阶级生活很困苦，就连民族资产阶级的生存和发展也受到威胁。因此，中国无产阶级不但能联合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而且能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结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

(2)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在辛亥革命后，始终坚持不懈地进行反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斗争，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这些斗争屡遭失败。在我党产生以前，孙中山始终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陷于绝望中的孙中山看到了希望，他欢迎十月革命，表示要“以俄为师”，愿意接受俄国的帮助。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孙中山以深刻的影响，他表示愿意改组国民党，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这个组织可以容纳不同的革命力量，有可能改造成为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

(二) 建立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是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

1. 新三民主义的特点：(1) 新三民主义具有反帝反封建

的革命内容。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对外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反对帝国主义；对内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民族压迫。新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主张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为少数资产阶级所专有。新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实行“耕者有其田”，反对“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反对私有资本制度“操纵国民之生计。”(2) 新三民主义是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灵魂的。

2. 具有反帝反封建内容的和三大政策相结合的新三民主义，同我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政治纲领基本上是一致的。它不仅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也符合工农群众当时的基本利益。因此，它成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成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五、党和毛泽东同志是怎样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一是无产阶级领导，二是同盟军，即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三是革命对象与任务，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四是革命前途，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努力。其中无产阶级领导是核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

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是靠全党在革命斗争中，努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不断探索，逐渐形成的。

(一) 党在“二大”、“三大”前后的探索。一九二二年七月，党的“二大”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但没有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一根本问题。一九二三年六月，党的“三大”阐明了中国无产阶级的责任，首先应竭尽全力参加国民革命，并唤醒农民，联合资产阶级，以革命的方法，建立政权，取得政治自由和民族独立。但没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二) 党的“四大”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一九二五年一月，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四大”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强调了农民同盟军的极端重要性，大会还确定党对国民党采取扩大左派、争取中间派和打击右派的政策。决定在全国积极建立和加强党的组织。虽然“四大”有缺点，如对资产阶级两面性、农民的土地要求和武装等问题认识不够，但已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四大”前后，邓中夏、李大钊、瞿秋白、高君宇等，针对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右倾思想，都曾发表文章，对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尤其对提出无产阶级领导地位问题作出重要贡献。

(三) 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全面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指明了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同盟军、革命对象和革命前途等基本问题，从而完整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1. 阐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他指出，现代工业

无产阶级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由于分布集中、经济地位低下，特别能战斗，所以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

2. 指明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最接近的朋友。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分为三种情况：有余钱剩米的、大体上可以自给的、生活下降的。这三部分人平时虽然有所不同，但到革命高潮时都可以参加革命或附和革命。半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生活是极端困苦者。因而，极需要一个变革现状的革命，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所以，他们是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

3. 指出中产阶级对革命持矛盾态度不能领导中国革命，中产阶级要建立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只能是幻想。毛泽东把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阶级区别开来，指出中产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经济上有遭受帝国主义排挤和封建主义束缚得不到充分发展的一面，也有剥削工农群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一定联系的一面，因而在政治上有赞成或参加民主革命的一面，也有害怕革命、怀疑革命，以至动摇妥协的一面，所以他们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十月革命后的世界形势，是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最后斗争的局面，他们想走中间道路，建立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只能是幻想。这便指明了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

4. 指出地主、买办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对象。地主买办阶级在经济上完全是帝国主义的附庸，代表最落后、最反动的

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政治上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是革命的敌人。

这样，毛泽东集中了当时党内的正确主张，全面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无产阶级团结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一切半无产阶级（主要是贫农）、小资产阶级（主要是中农），争取中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买办阶级，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统治，反对在中国建立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

六、举行北伐战争及迅速 取得胜利的原因

（一）出师北伐的原因

1. 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和连年混战，使得中国民困国弱，广大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北洋军阀部队分为三支：直系军阀吴佩孚、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皖系军阀孙传芳。一九二六年五、六月间，张作霖、吴佩孚共同策划了联合进攻革命势力的反革命阴谋，北方由张作霖的主力围攻倾向革命的冯玉祥国民军；南方由吴佩孚出兵湖南，并联合各地军阀围攻广东革命根据地。这就使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北伐战争势在必行。

2. 一九二六年二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准备北伐战争问题，确定了北伐战争的方针。之后党从各方面大力推动广东革命政府进行北伐战争。五月，党通过广东

革命政府，派我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先遣队进入湖南，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七月一日，广东革命政府在我党的影响和推动下，发表《北伐宣言》，出师北伐。

（二）北伐战争迅速取得重大胜利的原因

北伐军从一九二六年七月出师，不到半年时间，打垮了吴佩孚，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占据了湖南、湖北、福建、江西、浙江、安徽、江苏等半个中国，把革命迅速推进到长江中下游，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1. 北伐战争胜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是在中国共产党影响、推动和组织下进行的一场消灭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及其走狗——封建军阀的革命正义战争，因而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特别是工农群众的全力支持。

2. 我党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中，联合了国民党左派，执行了正确的战略、策略，提出了正确的革命口号，进行了有效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

3. 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广大官兵，在北伐战争中英勇作战，特别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战斗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4. 苏联的人力、物力支援。

七、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中，是怎样论述无产阶级领导农民
运动问题的？有何重大意义？

一九二七年初，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农民问题成为革命

与反革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斗争的焦点，成为左右中国革命全局的关键。为了驳斥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支持农民的革命斗争，毛泽东对湖南五县农民运动进行了三十二天考察，三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运动的正确理论和政策。

（一）党领导农民运动的基本理论与政策

1. 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强调了党领导农民运动的极端重要性。文章指出，农民运动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将被他们葬入坟墓。因为封建势力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墙脚，打倒封建势力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因此，农民运动“好得很”，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应积极支持和领导农民运动。

2. 明确指出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重要性。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地主阶级权力的革命。只有实现“一切权力归农会”，才有可能实现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各项要求，因此，建立农民政权是革命时期的中心斗争。而地主武装是地主政权的支柱，为了建立和巩固农民政权，就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3. 正确地分析了农民的各阶层，提出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他指出农村各阶层的经济地位不同，因而对革命的态度也不同。富农始终是消极的，中农是游移的，一向苦战奋斗的是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贫农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革命大业的元勋。因此，党

必须采取坚决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政策。

4. 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革命思想。他坚决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坚决支持当时农民所进行的农村大变革，充分肯定了农民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并列举农民协会所做的十四件大事，以此来批判反动阶级对农民运动的责难。

（二）重大意义

这篇文章总结了农民革命斗争的经验，提出和解决了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驳斥了反动阶级对于农民运动的攻击，批评了陈独秀在农民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鼓舞和推动了正在开展的农民运动，它是我党领导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它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章的发表，标志毛泽东思想在大革命时期已经萌芽。

八、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标志、错误的主要内容及其危害

（一）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标志，是党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于汉口召开的特别会议。陈独秀在特别会议上作了政治报告，会议根据政治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案。

1. 错误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随着北伐战争和工农革命运动的胜利发展，一九二六年底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勾引下，已把

斗争矛头指向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人民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矛盾已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这种形势要求我们党迅速准备工农武装力量，团结国民党左派，粉碎蒋介石分裂统一战线的阴谋。而陈独秀的政治报告及其决议案却认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民众运动勃起并日益向“左”，蒋介石恐惧民众运动而日益向右，“左”、右倾距离日远，会破裂统一战线而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

2. 会议决定对国民党右派继续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全面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上述思想指导下，会议决定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扶助国民党左派，建立以汪精卫为首的“文人政府”，使他们控制党权、政权和群众运动领导权，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上述错误决定，实质是信任蒋介石、汪精卫超过了信任人民群众，不惜牺牲工农的根本利益来迁就蒋介石的反动要求，结果助长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气焰。

上述会议内容，得到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赞同。这次会议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标志。

（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错误

1. 在统一战线中对资产阶级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特别是对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一味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拱手把革命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例如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二大”期间，由于我党在选举中妥协退让，使右派在国民党中央占了绝对优势；在三月发生的“中山舰事件”中，由于陈独秀采取退让的方针，蒋介石轻而易举地篡夺了国民革命

军第一军的军权；在五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陈独秀强迫我党代表签字通过《整理党务案》，使蒋介石削弱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领导地位，篡夺国民党党权的阴谋得逞。直到一九二七年六月三十日，陈独秀主持通过“国共合作十一条决议”，明确提出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把群众团体、工农武装的领导权都拱手让给了国民党。

2. 放弃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农民。陈独秀忽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不了解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因而不敢领导农民斗争，不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在革命高涨时，他极力压制和破坏农民运动，曾规定农民协会“不可简单地提出打倒地主的口号”，农民武装“不得超出自己的范围”，“不可有常备组织”，“不许收缴民团枪械”，“不得干涉行政”等等。企图以牺牲农民的根本利益为代价，换取同资产阶级的合作。结果使无产阶级失去广大而可靠的同盟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地步，使革命事业遭到惨重损失。例如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在驻长沙反动军官许克祥叛变的“马日事变”中，附近各县农民自卫军准备进攻长沙，陈独秀强令制止，致使一万多工农群众被杀害。

3. 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陈独秀不了解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他反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掌握武装力量，反对和限制工农武装力量的发展，甚至对已经组织起来的工农武装也要解散。结果导致大革命的失败，这是血的教训。

总之，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本错误，就是放弃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的私利。

（三）对革命的严重危害

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后，严重压抑和限制了工农革命运动的发展，助长了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的反动气焰，解除了党的思想武装，当蒋介石、汪精卫公开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时，党和人民革命力量毫无准备，以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遭到惨重的失败。

九、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及其经验教训

（一）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1.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革命的力量。当时各帝国主义国家正处于暂时稳定的时期，他们联合起来，与北洋军阀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相勾结，形成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官僚买办的反革命联盟，尤其是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大大改变了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对比。而党领导的有组织的革命力量特别是武装力量太弱，这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

2. 党当时还比较幼稚。党刚成立不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对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都没有经验，党员的数量和领导水平都不能适应革命的需要，发动群众不够普遍和深入，组织程度不高，革命力量的发展很不平衡，因而不能及时识别和粉碎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阴谋。

3.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于大革命后期在党中央占了统治

地位。他不敢放手发展党和工农革命力量，自动放弃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农民同盟军和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加上共产国际代表的错误指导，就使得党和人民革命力量处于软弱无力的状态。当帝国主义把蒋介石、汪精卫拉过去，联合向革命力量进攻时，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许多党员和工农群众被屠杀，党和革命的组织遭到破坏，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惨重的失败。

（二）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

1. 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建立一条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革命统一战线，而统一战线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对资产阶级必须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决不能让资产阶级篡夺革命的领导权。

2. 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只有坚决依靠农民作为自己的同盟军，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统一战线才有坚实的基础，才能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3. 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没有革命的武装，就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不可能建立革命的政权，因而也就不会有人民的地位，不会有革命的胜利。

4. 党的建设是巩固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和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因而必须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坚强的、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党，否则革命必然遭到挫折、失败。

附 录

【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是以一九一五年陈独秀创刊的《新青年》（原名《青年》、一九一六年九月改名《新青年》）为标志。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提倡“民主”与“科学”。明确提出：反对封建的特权政治，要求政治民主；反对封建道德，提倡民主主义的新道德；反对封建的旧文学，提倡民主主义的新文学。陈独秀、李大钊是这个运动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首先揭起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礼教与封建文化进行冲击。李大钊发表的《青春》等文章，发出青春的赞歌，催促青春之中国的诞生。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成为一名勇猛的民主主义文化战士。他发表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对吃人的封建礼教进行了血泪控诉，开拓了中国新文学的道路。但新文化运动仍属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不能给中国指出新道路。它是一次解放思想的启蒙运动，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道路。

【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三次论战】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经过三次激烈的论战。第一次

是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同胡适派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论战。一九一九年六月，胡适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在“反对空谈主义”的幌子下，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研究具体问题为借口，反对根本解决的社会主义革命。对此，李大钊发表致胡适的《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公开信，批驳了胡适实用主义观点。他认为“问题”与“主义”不可分离，只有多数人有共同趋向的理想与主义，才能共同解决社会问题。他强调“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可能把一个个具体问题都解决得了的希望”，俄国十月革命就是榜样。第二次论战，是一九二〇年十月开始的，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人与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代表研究系的政客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张东荪、梁启超极力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是一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认为中国当务之急是发展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主张通过由资本主义占支配地位的协社（合作社）来实现社会主义；反对暴力革命，反对建立共产党。陈独秀、李大钊等发表文章，驳斥了张东荪等主张的所谓发展资本主义能使中国人过着人的生活的虚伪性，同时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实现独立富强只能是一种空想。至于劳资协调，只不过是劳动人民安于奴隶地位不思反抗而已。第三次论战，是陈独秀、李达等与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区声白等人的论战。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间，黄凌霜、区声白等先后发表文章，主张个人自由、个性解放，反对一切国家、一切权威，反对一切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从一九二〇年起，陈独秀、李达等撰

写文章，批判了无政府主义思潮，他们指出，共产主义者主张推翻资产阶级国家之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否则共产主义就不能实现。在人类社会，那种离开社会的个人“绝对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通过三次论战，粉碎了各种反动思潮的进攻，扩大了马克思主义阵地，更加坚定了早期共产主义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建立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伟大前途的信心，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进一步创造了条件。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共有十三人，他们来自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日本等七个共产主义小组。他们是：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刘仁静、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等，代表着全国五十余名共产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柯尔斯基也参加了会议。

大会的中心任务是讨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领导无产阶级以武力实行彻底的社会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党的组织要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吸收党员必须具有严格的手续和条件。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规定，党在当前的中心工作是领导工人运动。

大会选举了由三人组成的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

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从此，在中国出现了新型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南的、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它使中国无产阶级有了自己坚强的战斗司令部，使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使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有了可靠的保证，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便焕然一新了。

【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制定中国革命的纲领。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党成立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章程》。

大会宣言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性质，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然后再进一步创造条件，以实现党的最高纲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阵线的决定。大会选举了党的中央委员会，陈独秀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党的“二大”的主要功绩是，解决了中国近代革命历史上

所没有解决的问题，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给全国人民指明了争取解放的正确道路。

【二七惨案】 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在我党领导下，京汉铁路各站工会在郑州举行总工会成立大会时，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武力镇压。为了争取自由权利，反抗吴佩孚的镇压，京汉铁路全体工人于四日实行总同盟罢工，使一千多公里长的京汉铁路陷于瘫痪。七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对汉口江岸、郑州、长辛店等地工人进行了血腥镇压，杀害五十人，伤三百多人，工人家属也遭到洗劫，造成一千多人的流亡。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武汉工团联合会律师、共产党员施洋宁死不屈，英勇就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二七惨案。二七惨案后，总工会为保存力量，便忍痛下了复工的命令。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是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最高峰。这次罢工失败后，在军阀统治下的各地工会大部分被反动军警捣毁和封闭，许多工人领袖被捕牺牲。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这次大罢工的失败，说明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强大的同盟军和武装力量，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党必须联合农民和一切民主势力，结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去反对共同的敌人，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国民党“一大”】 一九二四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积极努力下，接受了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正式决定了联苏、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重新解

释了三民主义。通过了承认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大会选举了有共产党员参加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后，各省、市的国民党党部也大部分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国民党，基本上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组织形式。

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国共合作的形成，推动了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内的先进分子，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国民党内右派势力的革命斗争，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成为革命高涨的起点。

【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在上海举行。出席代表二十人，代表党员九百五十人。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问题。在大会通过的中央执委会报告、大会宣言以及大会决议案中，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大会总结了国共合作以来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开展群众运动的计划，并决定在全国建立和加强党的组织，以适应革命大发展的需要。大会选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这次大会提出了以前党的历次大会所没有提出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等问题，为即将到来的革命新高潮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五卅运动】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四日，上海日本纱厂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无理开除中国工人和扣发工资，举行了罢工。十五日，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伤多

人。这一暴行激起上海工人、学生和市民的愤怒。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分析上海各阶级的动向，决定发动群众于三十日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帝示威。五月三十日，上海学生及其他群众举行反帝的游行、讲演，租界巡捕开枪镇压，死十余人，伤多人，造成“五卅”惨案。当晚，中共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斗争扩大到各阶级、阶层中去，组成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发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六月一日，上海总工会成立，同时举行了二十万工人总同盟罢工，五万学生罢课，绝大部分商人罢市，实现了“三罢”。七日，成立了上海反帝运动的领导机关——工商学联合会，并提出反帝要求十七条。从此，反帝斗争席卷全国，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大风暴。帝国主义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一面调集武力镇压，一面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威胁利诱。在帝国主义一打一拉的政策下，民族资产阶级妥协动摇，六月二十三日，上海总商会单独停止罢市，破坏了“三罢”。随后，上海总工会和工商学联合会被封闭。至此，上海的群众运动暂时受挫。党为保存革命力量，巩固工人已得的胜利，决定停止总同盟罢工。“五卅”运动，给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极大地提高了全国人民的觉悟，揭开了大革命高潮到来的序幕。

【中山舰事件】 是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发生的，也叫“三二〇”事件。这是蒋介石为篡夺军权制造的一起反共阴谋事件。国共合作后，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影响和作用日益加强，这就引起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集团的疑虑和不安，图谋设法打击和削弱共产党。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蒋介石和

他的同伙设置一个圈套，指使其亲信，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传达命令给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调中山舰到黄埔候用。当中山舰抵黄埔后，又否认有此命令。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借口“共产党阴谋暴动”，宣布广州戒严，断绝内外交通，调动军警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与苏联顾问办事处，逮捕李之龙、扣押中山舰，并拘捕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全体共产党员，强迫共产党人退出第一军，篡夺了第一军的军权。使共产党在军队的力量受到一次重大的打击。

【整理党务案】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会上，蒋介石提出了旨在限制共产党、篡夺国民党党权的《整理党务案》。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不得占委员三分之一以上，共产党员不得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保存，第三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都须先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整理党务案》通过后，共产党担任的国民党中央部长被国民党右派所代替，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主席，并兼任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随后，蒋介石又通过国民党中央任命自己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按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出征动员令下达后，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政、民、财各机关均须受总司令指挥。这样，蒋介石垄断了国民党的党政军财大权。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上

海工人为配合北伐军进军，推翻军阀统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三次武装起义。第一次是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第二次是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一日，这两次起义由于准备不足和时机不当而失败。第三次起义是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参加的中共特别委员会领导下，认真总结前两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对武装起义作了极周密的计划和充分的准备，在三月二十一日举行起义，经过三十个小时的激战，打败军阀部队，占领上海，起义取得胜利。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极大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动统治，表现了工人阶级的英雄气概和坚强的革命力量，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不断制造反共暴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蒋介石即到上海和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密谋举行反革命政变。中国共产党内，由于陈独秀采取右倾投降主义政策，使党和人民对突然事变处于无戒备状态。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利用雇用的一批流氓，冒充工人，袭击工人纠察队队部。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周凤岐部随即借口“工人内讧”，强行将工人纠察队缴械，纠察队员死数十人，伤二百余人。十三日，上海工人举行总罢工，并有十余万工人、学生和市民集会抗议，会后举行游行示威，队伍行至闸北宝山路时，遭国民党军队屠杀，死百余人，伤无数。接着，蒋介石封闭了上海总工会和其他革命团体，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群众，仅三天内即有三百多人被杀，五百多

人被捕，五千多人失踪。这就是蒋介石制造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马日事变】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在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的阴谋策动下，长沙驻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团长许克祥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反动军队封闭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国民党省党部及其他一切革命团体，捣毁省特别法庭，释放关押的全部土豪劣绅，将工人纠察队一千余人和农民自卫军全部解除武装，并杀害一百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使长沙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这就是“马日事变”（因二十一日电报代日韵目是“马”字，故称这一事件为“马日事变”）。这一事变是武汉的汪精卫集团和南京的蒋介石集团进行合流的一个信号。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蒋介石叛变后，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也加紧反革命活动。六月十日，汪精卫和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策划反共。六月十九日，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举行会议，密谋蒋汪合作，共同反共。对此，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不仅不作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而且命令武汉工人纠察队将武器交给汪精卫的武汉政府。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封闭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至此，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终于失败。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8——1937.7)

十、蒋介石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性质、特点及其对内对外政策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建立了反共反人民的新军阀统治，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

(一)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性质、特点

✱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统治，就其阶级性质来说，依然是城市买办和乡村豪绅地主阶级的统治。新军阀的阶级实质与旧军阀是相同的，它的特点是更具有欺骗性、买办性和残酷性。

1、国民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是各阶级以新三民主义为合作基础的革命联盟，蒋介石叛变之后盗用了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的名义，打着三民主义的招牌，实行反动统治；蒋介石握有的国民党军队，曾经在革命的旗帜下同旧军阀打过仗，在群众中有过一定影响。四一二、七一五国民党叛变革命后，成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派。

因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军阀，更富有欺骗性。

2、蒋介石新军阀统治是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建立起来的。在经济上逐步形成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以此作为它实行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因此，蒋介石新军阀比旧军阀具有更大的买办性。

3、蒋介石新军阀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反革命军队。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远远超过旧军阀；同时它还建立一套庞大的全国性的特务组织，实行法西斯统治。因此，它更具有残酷性。

(二)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

1、对内政策是镇压革命，压迫和剥削工农群众。

(1) 在政治上，主要表现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建立起来的拥有三百万会员的各地工会被解散、被封闭，工人领袖和积极分子被开除、被迫害。在农村，地主豪绅疯狂地反攻倒算，解散农民协会，捕杀农民领袖和积极分子。在白区，对文化革命运动实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一方面极力宣扬反动腐朽的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另一方面采取高压手段，颁发《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禁止进步书刊，封闭进步书店，破坏进步文化团体，迫害、监禁进步作家和爱国人士。

(2) 在军事上，对农村革命根据地反复实行反革命军事“围剿”，企图消灭红军和共产党的革命力量。

(3) 在经济上，用政治强制和军事掠夺的办法，搜刮民财，内战起家，迅速形成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垄断全国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

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蒋介石国民党新军阀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

2、对外投降卖国依靠帝国主义。

(1) 国民党政府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七月连续发表媚外声明，宣布它的外交政策是维持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一九三〇年四月十八日，又发表对外宣言，承认帝国主义各国和中国历届反动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2)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允许帝国主义在华经济侵略势力不断扩张。主要表现在：①帝国主义对华投资迅速增加，如日本“九一八”事变前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增加四倍；②在财政金融方面，允许外国在中国境内发行纸币，操纵中国市场价格；③在交通方面，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在中国的控制权，中国的铁路和航运到九一八事变时，百分之八十控制在外国手里；④在工矿企业方面，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垄断权，扼杀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3)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支持帝国主义干涉、镇压中国革命的侵华事件。一九二八年三月，它向炮击南京、镇压中国革命的英美帝国主义表示歉意，赔偿损失，并下令通缉反抗帝国主义的共产党人林伯渠，为帝国主义“惩办凶手”。五月，对日本帝国主义杀伤中国军民的济南事件，不仅不下令抵抗，反而怂恿，并下令“为救一日人，虽杀十人亦可”。

国民党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进一步表明其反动统治的阶级实质。

十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内容和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举行的。

(一)大会的主要内容

大会听取了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所作《中国革命与中共任务》的报告，瞿秋白所作的政治报告，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党在今后的任务。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的报告，李立三作了农民问题的报告。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等各项决议。大会还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了六届中央委员会。

大会报告和各项决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规定了中国革命的任务。大革命失败以后，共产国际代表和瞿秋白夸大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成分，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六大”肯定了大革命失败以后的中国社会仍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指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大会明确规定：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指出：消灭地主阶级，彻底实行土地革命；驱逐帝国主义，统一中国；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

为了实现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任务，大会提出了十大纲领：①推翻帝国主义统治；②没收外国资本主义的企业和银行；③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④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⑤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⑦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耕地归农民；⑧改善兵士生活，发给兵士土地和安置工作；⑨取消一切军阀政府地方的税捐，实行统一的累进税；⑩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2、分析了大革命失败以后的政治形势，制定了党的基本策略方针。大会对政治形势的认识上存在“左”的和右的两种倾向：一种是无视革命已经走向低潮的客观现实，认为革命仍在高涨；另一种则是右的悲观情绪。大会明确指出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革命运动发展是不平衡的，高潮是不可避免的。根据对政治形势的这一分析，指出党的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武装起义。

(二)“六大”的历史意义

“六大”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历史转折关头，正确地指出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规定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正确地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制定了党的基本策略方针，回答了急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六大”所制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六大”的缺点和错误是对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

十二、古田会议的主要内容和历史意义

(一)古田会议的主要内容

古田会议，是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召开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大会根据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红军的建设经验，批判了各种错误思想，坚持以无产阶级思想建设人民军队和进行党的建设，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其核心部分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大会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书记，有朱德、陈毅等参加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以下简称《决议》）的基本精神，是强调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党，建设军队。其主要内容是：

1、《决议》强调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强调要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同时注重组织建设。《决议》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而党的领导机关对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缺乏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进行正确的路线教育，乃是使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是教育问题。思想教育主要是正确的路线教育，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头脑，反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和平均主义，教育党员向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坚决斗争，使党员的生活和党内的生活都

“政治化、科学化。”

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决议》分析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和来源，提出了克服的办法。

关于组织建设，《决议》指出，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要有党的观念。反对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点，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贯彻“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正确地开展党内批评，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使党的组织成为领导革命斗争的坚强堡垒。

2、《决议》规定了人民军队的性质、任务以及建军的根本原则。

(1)《决议》指出，我们所建立的军队，必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定着军队的性质和面貌，是我军建设的根本原则。

(2)《决议》重申红军的三大任务。《决议》指出：红军决不是单纯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3)《决议》还规定了红军的内部外部关系。实行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的原则和废止肉刑，宽待俘虏，瓦解敌军等项政策。

(二)古田会议的历史意义

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

1、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决议，系统地总结了红四军建党建

军方面的丰富经验，确定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从根本上划清了人民军队与旧军队的界限，解决了长期处于农村游击战争环境里，如何把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份的军队建设成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它是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2、《决议》关于红四军党的建设的经验总结，确定了党的建设的原则，解决了长期在农村环境里，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份的共产党的组织如何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重要问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

十三、中国革命为什么必须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一)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基本内容

武装夺取政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十月革命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经验，这就是武装夺取政权。但是，如何实现武装夺取政权的任务，由于各国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必须走不同的道路。在俄国，是先占城市，后占农村；在中国则与此相反，必须是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就基本内容说来就是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根据地为依托，实行土地革命，三者紧密结合。

(二) 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1、必要性。(1) 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的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中国革命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的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

(2) 由于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的同盟军，总是长期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广大农村则是他们统治的薄弱环节，而农民又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因此，无产阶级要坚持革命，避免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与敌人作决定胜负的较量，就必须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长期积蓄并发展革命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 B5P107

2、重要意义。毛泽东指出，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是半殖民地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巨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

(三) 中国革命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可能性

见毛泽东 P. 147
毛泽东深刻地论述了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中国小块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

1、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地方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白色政权的长期分裂和战争，这是在一四围白色政权包围中，小块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原因。在经

济上，由于地方农业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它可以脱离城市而独立生存，不象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农村需要依赖城市。在政治上，革命力量可以利用反动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新军阀之间的内部矛盾和冲突及军阀混战之机，存在和发展。

2、受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影响的地方，如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处，红色政权首先容易建立和发展起来。

3、大革命失败以后，引起中国革命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并且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紧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加强而日益发展和激化。因此，尽管革命处于低潮形势下，但全国革命形势必然要向前发展的，这对于小块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是具有相当影响的。

4、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与地方武装相结合，就能够对付正规化的白色军队，这是能够造成长期割据局面的一条极其重要的条件。

5、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正确，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主观方面的极为重要的条件。毛泽东总结了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失败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军阀统治的状况和敌我军事态势，提出了一系列正确政策。如在敌人内部发生分裂和战争时，红军则应采取攻势，在反动统治比较稳定时，则应采取守势。红色政权应当波浪式地向前发展等。

综上所述，中国革命必须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城市。这是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

十四、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路线的形成 过程、基本内容及其重大意义

（一）形成过程

实行土地革命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农村工作的基本任务。要完成土地革命任务，必须有一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路线，是在土地革命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同来自“左”的右的方面，特别是在同“左”倾错误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

一九二七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即领导根据地人民，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斗争。一九二八年六、七月，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和《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深刻分析了中国的土地问题，规定了党的土地政纲，提出没收地主豪绅阶级的财产、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使用；分析了富农的特点，指出对富农采取又联合又斗争、中立富农的策略；联合中农；巩固贫农、雇农在农民组织中的领导权。一九二九年二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民运动的策略通告中，明确指出土地斗争的方针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而不是没收一切土地。四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兴国土地法》，根据“六大”精神，并结合赣南土地革命斗争的经验，纠正了一九二八年《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的规定，改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及公共土地。七月，闽西召开第一次党

代表大会，在毛泽东指导下，大会提出在土地革命中要区别大小地主与富农，保护大小商店，“不打击富农”，不使中农受“任何的损失”，“集中攻击目标于地主”。同时规定土地的分配方法，应以乡为单位、按原有耕地为基础，“抽多补少”，按人口进行平均分配；对在乡的地主“将酌量分与土地”。一九三〇年五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通过《土地暂行法》，重新提出按劳动力分配土地及组织集体农庄的主张，从“左”的方面干扰了土地斗争。十月，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指出以政府的法令或者以决议禁止土地买卖和租借是脱离全体农民群众的过早办法，应予纠正。翌年二月，毛泽东在《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信》中，明确提出确立农民土地所有权的重要性。接着，江西工农民主政府发表《土地是我们的，耕种起来啊》的文告，正式宣布土地归农民所有，并在土地纲领中作了明确的规定。这样，到一九三一年便形成了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正确的土地分配办法。到一九三四年，毛泽东对这条路线作了明确的概括。

（二）基本内容

党的土地革命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分配办法是，在原有耕地基础上，按人口平均分配，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给地主富农分同等的土地。

（三）重大意义

党的土地革命路线，正确地解决了党在农村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根本问题，反对了“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把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才能充分地发挥人民群众的无穷力量，才能使队伍有雄厚的兵源，才能保证军队的装备和战争物资的供应，克服由战争引起的巨大困难，才能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发挥我军的优点，利用敌军的弱点，战胜敌人。

(四) 毛泽东关于中国工农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的重大意义 见译本P:134

它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地反映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规律。它解决了红军以劣势兵力和落后装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战胜敌人的一个极其困难而复杂的问题。它是指引人民军队战胜敌人的强大武器，是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的重大发展。

十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 的主要错误及其危害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是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他们站在更“左”的立场上抨击立三“左”倾错误，认为它是在“左”的词句下掩盖着右的实质，“右倾依然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从而推行一条比立三错误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更加完备的“左”倾冒险主义。王明在六届三中全会以后陆续写成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的小册子），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态下，继续恢复和发展立三“左”倾错误的总纲领。

（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主要错误

1、在中国革命性质、阶级关系问题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严重地打击了中间势力。他们认为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把反帝、反封建同反对资产阶级并列起来，认为“现在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取得彻底胜利。”

2、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他们认为“直接革命形势”在包括有中心城市的主要省分，很快就会到来，在这些地区有“首先胜利的可能”。党的任务是要动员、组织与武装革命根据地的千百万群众，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以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因此，他们竭力主张党在战略上要采取“进攻路线”。

3、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坚持“城市中心论”。他们不懂得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革命的特点，不懂得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因而低估了武装斗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他们提出反对所谓“枪杆子主义”和所谓“农民意识的地方观点与保守观点”，追求在大城市“真正”准备武装起义，梦想达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4、在白区工作上，搞“左”倾冒险主义，压制刘少奇关于白区工作的正确主张。他们在强大敌人统治的中心城市里，不顾白色恐怖，拒绝实行必要的退却和防御，拒绝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竟采取为当时情况所不允许的进攻形式和冒险行动。每逢节日都盲目地要求在一些大城市举行罢工、罢课、

罢市和飞行集会，乃至发动武装起义。

5、在军事上，“左”倾领导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战争一开始，就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得失，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向有巩固阵地的白区进攻，使红军陷入被动地位。一九三四年春，广昌失守后，“左”倾领导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把口，东堵西截，穷于应付，以致兵日少而地日蹙。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后，“左”倾教条主义者又惊慌失措，把红军战略转移当作大规模搬家式的行动，使红军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犯了退却中逃跑主义错误。

6、在组织上实行“左”倾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在党内搞过火斗争。他们以积极拥护和执行王明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往各根据地、派“钦差大臣”。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排斥、打击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及拥护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干部，开展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在党内抓所谓右派，把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同肃反扩大化相结合，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给党和中国革命造成严重危害

主要表现：

1、遭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农村革命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中国工农红军由三十万减到三万人（其中大部损失是王明“左”倾错误造成的）。

2、党在白区的地下组织和革命力量比苏区的损失更大些，几乎全部被破坏。

3、在党的生活方面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发展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倾向，使党内新鲜活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受到打击和压抑，大批优秀党员和干部遭受诬陷和错误处理，极大地削弱了党的组织和党的战斗力。

十七、为什么说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一)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处于危急的历史关头召开的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共中央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下，完全听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意见，在军事路线上，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使红军遭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被迫长征。中共中央亦随军转移。长征初期，红军在敌军围追堵截中失散、伤亡极为严重。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湘江一役付出惨重代价，人员折损过半，中央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八万余人减少到三万余人，陷于危急之中。这时如果不改变与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红军主力就有覆没的危险。由于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改向贵州方向进军，一九三五年一月过乌江占遵义。同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二）遵义会议的主要内容

遵义会议解决了最紧迫的两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军事路线和中央的组织领导问题。

1. 关于军事方针。会议开始，犯有“左”倾错误的领导人秦邦宪（博古）在所作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中没有认识到在军事指导方针上所犯的严重错误，过分强调客观原因。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着重分析和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中在军事指导方针上的严重错误。毛泽东的发言得到绝大多数同志的拥护，包括犯有“左”倾错误的多数人。会议委托张闻天（洛甫）负责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决议》按照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系统地深刻地批评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领导人的严重错误。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退出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他们“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在内线作战下，在绝对优势敌人进攻面前，红军必须实行退却与隐蔽，集中优势兵力寻求战役的外线作战，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战略战术原则。《决议》深刻批评了所谓“不放弃苏区寸土”的口号，指出这个口号在军事上，尤其在战略上只不过是单纯防御路线的掩盖物；单纯防御与“短促突击”，分兵抵御，是战争中的机会主义战略战术，实际上是对堡垒主义的投降。

2. 关于中央政治局的组织领导。会议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随后，在行军途中，中央先后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小组，负责军事指挥工作。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三）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长期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党的组织领导和路线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军事路线指导下，根据敌情和军事态势的变化，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改变北渡长江意图，挥戈东指，取得遵义战役的重大胜利。四渡赤水，声东击西，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甩开尾追之敌，变被动为主动。中央红军还以惊人的毅力和英雄气概，战胜天险，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与此同时，在毛泽东领导下，克服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取得长征的重大胜利。

十八、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的基本内容和意义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一）基本内容

1. 在抗日的条件下，同民族资产阶级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报告》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变化面前，改变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

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最坚决的力量。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他们和农民一样，有同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他们中的很多人陷于失业、破产或半破产的境地。现在面临着要当亡国奴的危难关头，除了反抗，别无出路。

民族资产阶级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报告》根据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科学地论证了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的特点。明确指出：它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是有区别的，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他们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九年间，追随大资产阶级并没有得到好处。因此，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下，民族资产阶级的大部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即使其右翼也有由动摇

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这个变化的特点是动摇。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害怕革命的彻底性。

《报告》还深刻地分析了国民党反革命营垒及其内部的矛盾。指出：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铁板一块。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这是由于半殖民地的环境，即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所造成的。而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又增大了这种破裂的可能性。因此，“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报告》正确地估计了革命和反革命力量的对比，论述了建立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报告》指出，现实革命力量比较过去更增长了，但是反革命力量暂时还大于革命力量，中国革命发展还很不平衡，这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战胜强大敌人，必须经过长期斗争，花费很大的气力，还要依靠党的策略路线的正确。

总之，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实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出发点。

2. 《报告》尖锐地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报告》指出，关门主义是孤家寡人的策略。他们看不到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行为能够变动中国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从而否认组织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因此，他们就不会拿着统一战线这个武器去组织和团聚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中国卖国贼这个最中心的目标攻击前进，反而把子弹打在次要敌人甚至同盟

者身上。这样，只能“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博得敌人的喝彩。这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奴仆。

3.《报告》强调指出，共产党要担负起对统一战线的领导责任。敌人总是千方百计地破坏统一战线的，而统一战线内部的坏分子、不坚定分子退出统一战线的事情也会发生，《报告》强调要记取一九二七年革命统一战线由于缺乏革命中心力量，共产党放弃领导权而招致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报告》号召全党，在统一战线中要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要认真地担负起“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

（二）意义

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它深刻地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对瓦窑堡会议所制定的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从理论上给予了马克思主义的完整论述，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政策的理论基础。《报告》和瓦窑堡会议，解决了遵义会议以来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给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指明了方向。

十九、中国共产党为建立第二次 国共合作进行了哪些斗争？

瓦窑堡会议以后，中共中央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进行了艰巨的努力。

(一)首先争取联合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

华北事变以后，鉴于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广大官兵抗日情绪日益高涨，他们同蒋介石消灭异己政策的矛盾逐步加深，党确定了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的方针。1. 做好争取教育和释放俘虏工作；2. 一九三六年一月，以毛泽东、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名义发表《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明确指出红军愿意首先同东北军联合抗日；3. 四月九日，周恩来亲自到当时还在东北军控制下的肤施（延安），与张学良秘商联合抗日救国大计，并讨论了逼迫蒋介石参加抗日的可能性，订立了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等协议；4. 为了促进这一工作的迅速开展，中国共产党还派出一批干部到东北军中做中、上层统一战线工作。

与此同时，党还派人同杨虎城联系，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毛泽东亲自给他写信，说明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一九三六年二月双方达成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交通站及帮助红军运输等协定。中国共产党、红军同张学良所率领的东北军、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的联合，对于逼迫、推动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起了重大作用。

(二)加强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

一九三五年末，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北方局任书记之后，正确地贯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巩固和发展了“一二九”运动的成果，掀起了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一九三六年出现了许多抗日救亡团体，在上海由宋庆龄、沈钧儒等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接着又成立全国学生救国

会。各地主张抗日的进步书刊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是推动国民党当局联共抗日的重要社会力量。

(三) 由“抗日反蒋”的方针改变为“逼蒋抗日”的方针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国共产党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渡河东征，遭到阎锡山部队的阻拦，蒋介石调集十个师开赴山西增援。红军在歼敌万余，取得重大成果之后，五月五日，为了避免发生大规模内战，消耗国力，发出《停战建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敦促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民族危急关头，翻然改悔，停止内战，磋商抗日救亡办法。回师通电表明，中国共产党放弃“反蒋抗日”口号，在政策上由“抗日反蒋”转变为“逼蒋抗日”的方针。同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申明愿将“人民共和国”口号改成“民主共和国”，以便易于为国民党所接受。接着，又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为了实现逼蒋抗日的方针，一方面必须揭露与打击蒋介石对日每一退让、妥协和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以教育和发动群众；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订立抗日协定的要求。在“逼蒋抗日”方针下，中国共产党坚持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联合抗日，以利促使蒋介石转向抗战。

(四) 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及南京政府部分高级将领。西安事变引起国内国外的强烈反响。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制造混乱，企图挑起和扩大中国内战，以便趁虚而入。南京政府里的亲日派，为了适合日

本侵略者的需要，竟以政府名义宣布“讨逆令”。

面临这种极其复杂而严重的形势，中共中央为了顾全大局，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出发，全面地科学地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经慎重的考虑，毅然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以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为了实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党中央进行了艰巨的努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有秦邦宪、叶剑英参加的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参加谈判，最后达成六项协议：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自由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其他具体救国办法。从此，十年内战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开始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基础。

二十、怎样理解毛泽东思想是在同国际及 我们党内教条主义错误倾向的斗争 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指出：“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

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一）教条主义的主要错误

从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共产国际在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上，脱离中国实际，犯了主观主义、“左”的错误。中国共产党的“左”倾领导者，又把国际决议神圣化，机械搬用，犯了教条主义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1. 关于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一九二八年八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个所谓“第三时期”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世界形势从一九二八年进入了“第三时期”，即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尖锐化、“大规模阶级搏斗”时期，世界革命已进入新的高潮时期。据此，共产国际在指导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工作中制定了全世界范围的“进攻路线”。对中国革命形势和任务作出“左”的估计和判断。一九二九年，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夸大了国民党统治的危机，要求中国共产党现在就让群众准备用革命手段推翻地主资产阶级政权，一九三〇年六月又断定中国革命运动新高潮已经到来。一九三二年八月，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会，要求中国共产党把“推翻国民党政权”作为直接的革命行动。

中国共产党的“左”倾领导者，把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李立三按照“第三时期”理论和“进攻路线”，对中国革命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制定了武汉南京武装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实现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战略总方针。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照搬国际决议，断定第五次反“围剿”是中国革命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的决战，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2. 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共产国际把俄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绝对化，要求各国党都要象俄国一样地走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的“左”倾领导者，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完全是按照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思想和俄国革命的模式行事的。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规定“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各区的首先胜利，是目前党的策略总路线”。制定城市暴动和总同盟罢工的冒险计划。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把“占取一二个主要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作为党的“全部工作”和“总任务”。

3. 关于阶级关系和策略问题。由于斯大林把蒋介石看作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把汪精卫看作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因此当蒋汪叛变革命以后，就不能正确指出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基本格局和中国革命的任务、对象和动力，而把反帝反封建反对资本主义并列，从而导致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混淆。一九三〇年六月，提出“中国革命不仅要同中外资本家进行残酷的斗争”，而且要没收民族资本家的企业。他们还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否认“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仍然指示中国党要“采取下层统一战线”政策，排斥中间势力。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把中间势力作为“最危险的敌人”，实行“左”倾关门主义政策，严重地影响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二）毛泽东思想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初步形成

毛泽东以他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勇气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概，反对了把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的错误倾向。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党内“左”倾盲动主义刚刚出现的时候，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向长沙进攻受挫即及时地把部队引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第一个把红旗插在井冈山，在全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征途中，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在立三中央推行“国际路线”，一味地要攻占大城市的情况下，毛泽东在执行中央命令中有怀疑、有抵制，因而遭到立三中央的批评和指责。

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的年代里，毛泽东虽屡遭打击，但仍始终坚持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从中国国情出发，总结中国革命独特经验，提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理论原则和新的结论，是我党最早反对教条主义的。

一九三〇年五月，毛泽东所著《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是我党第一篇反对教条主义的重要文献。他针对教条主义者“唯上”、“唯书”，“不唯实”的特点，尖锐地批评了轻视中国革命实践，轻视群众斗争经验，开口“拿本本来”，动辄照抄照搬国际经验的错误倾向，指出这种作风“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并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从而得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结论。这是对把国际决议神圣化及教条主义的批评。这里实际上提出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基本思想，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正是在这一思想理论原则指导下，毛泽东总结革命实践经验，集中集体智慧，于一九二八、

一九三〇年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创造性地阐述了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可能性，提出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即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和反对本本主义思想，表明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开始形成。

附 录

【南昌起义】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根据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决定，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领导下，在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参加起义的部队，有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朱德率领的第三军官教育团，约三万人。起义部队经过五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守敌六个团，一万多人。战斗结束后，由周恩来主持，对部队进行了整编。贺龙任代总指挥，叶挺任代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同时，成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联合国民党左派和进步人士参加的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并由宋庆龄、贺龙、郭沫若、恽代英等七人组成主席团，吴玉章任秘书长，周恩来任军事参谋团主任，刘伯承任参谋长。革命委员会发布了宣言，提出革命政纲。八月三日至六日，起义部队退出南昌，南下广东。十月初，部队在潮汕地区遭到优势敌人的围攻，受到严重损失。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地区坚持斗争，另一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转战湘南，并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

南昌起义是在大革命失败的严重时刻，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开始，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

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后来八月一日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南昌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武装斗争必须与农民运动相结合。

【湘赣秋收起义】 一九二七年，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后，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到湖南传达了会议精神。湖南省委决定在湘赣举行秋收起义。部队有卢德铭率领的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即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王新亚率领的安源工人武装，以及平江、浏阳的农军等，共五千人。起义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四个团，卢德铭任总指挥，毛泽东任前敌委员会书记。

九月九日起，起义按原计划开始。部队分别向长沙进军中受挫，遂集中于文家市，前委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放弃攻打长沙，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进军的正确主张。部队向罗霄山脉挺进途中，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改编。在部队的连上建立了党支部，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十月，部队到达井冈山，开始创建第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

湘赣秋收起义同其他地区的秋收起义共同构成了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下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战斗洪流，扩大了党在农村的影响，成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起点。

【广州起义】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起义指挥部——革命军事委员会，省委书记张太雷任委员长。

十二月十一日凌晨打响了广州起义的枪声。在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下，工人赤卫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和郊区农民武装一起行动，占据了公安局、市政府、军事要隘、银行、车站等。成立广州苏维埃，苏兆征任工农民主政府主席（未到由张太雷代理），恽代英为秘书长，叶挺为工农红军总司令。次日，在西瓜园举行工农兵万人大会，成立工农民主政府宣布政纲。由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疯狂反扑，十三日，起义部队被迫退出广州。一部分干部转移到海陆丰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武装力量到左、右江地区与农民武装会合。

广州起义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样，是中国共产党人以武装斗争去回击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搏斗，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人阶级的英雄气概。

【九一八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侵华的目的，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驻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守备队，蓄意制造柳条沟事件，炸坏铁路，进行挑衅，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随即向沈阳北大营中国驻军和沈阳城发动突然袭击。紧接着，日军侵占了长春、四平、本溪、抚顺、营口等地。一九三三年又侵占热河、山海关。张学良的东北军奉蒋介石“绝对不抵抗”的命令，不战而退。从此，祖国东北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殖民地，三千万同胞饱受日本铁蹄蹂躏十四年。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的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严重事件。

【福建事变】 福建事变是国民党及其军队内部的爱国官兵，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反蒋主张和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

动和影响下发动的一次政变。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调到福建进行“剿共”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以及国民党内的李济深等反蒋势力毅然发动政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

福建政府在政治上主张“取消党治，还政于民”，“反对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国民政府”；经济上提出“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等政策。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同“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签定了抗日反蒋协定。福建政府成立不久，蒋介石出动大批军队前去围攻镇压，由于蒋介石军队力量的强大，由于王明犯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没有给福建政府应有的支援，而福建政府内部斗争又尖锐复杂，因而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宣告失败。

【一二九运动】 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救亡运动。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以后，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要使华北政权特殊化的需要，十一月决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进一步实行卖国主义政策，并派何应钦到北京负责筹建事宜。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救国。十二月九日，在北平中共地下党的组织领导下，北平学生六千余人，冲破反动军警的封锁，聚集到新华门前，向国民党反动政府提出六项要求，何应钦的代表对学生的爱国正义要求置之不理，学生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进行示威游行。这时何应钦又指使大批军警镇压示威游行的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一百多学生被打伤，数十人被捕。

十二月十日，全市学生总罢课，抗议反动军警对学生的血腥镇压。十六日，北平举行万人市民大会，并举行了示威游行。随后，大批爱国学生走出城市，南下农村，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很快得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响和大力支持。接着，南京、上海、天津、广州、杭州、武汉、长沙等十多个大城市的各界群众，先后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性的抗日斗争的新高潮。

一二九运动冲破了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恐怖统治，打击了国民党的卖国政策，使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它是中国学生运动史上继“五四”运动以后又一次大规模的英勇斗争。它充分表现了中国青年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开辟了青年学生与工农相结合的正确道路。

抗日战争时期

二十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特点及其重大意义

（一）形成过程

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同年八月一日，我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政治主张。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掀起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批评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一九三六年五月，我党发表回师通电，放弃反蒋口号，转而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同年十二月，在我党影响和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我党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协助张、杨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使之成为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换的枢纽，至此，十年内战基本结束，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形成。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党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采取了积极的步骤。七月十七日，党派周恩来、秦

邦宪、林伯渠到庐山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谈判。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延搁已久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二十三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我党的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二）特点

1.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因此它具有广泛的民族性，不仅包括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还包括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抗日时期，国民党统治集团并没有改变其反共反人民的本性，因此，统一战线中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2. 统一战线中的国共两党都有政府和军队，并且始终没有统一的合作纲领和组织形式，蒋介石想经过统一战线限制和削弱我党及人民革命力量，甚至想“借刀杀人”。因此，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3. 这时我党已经成熟，党和红军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台柱子，党有能力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事伟大的抗日战争。

（三）重大意义

国共两党重新结成统一战线，对推动抗日战争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尽管国民党把结成这个统一战线看作是不得已的敷衍的临时办法，“然而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

作用”。

二十二、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 两条不同抗战指导路线的 内容、根本分歧及其实质

(一) 内容

统一战线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集中表现在国共两党两条不同的抗战指导路线上。

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采取坚决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的方针，主张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改善民生，实行全国军队和全国人民总动员，使抗日战争真正成为人民战争，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这种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动员一切力量实行全民族抗战的路线，就是我党的全面抗战路线。

国民党从英美帝国主义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出发，采取对日妥协退让的方针，他们压制民主，反对改善民生，顽固地坚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主张由国民党政府包办抗战。这种单纯由国民党政府包办的，不要人民群众参加抗战的路线，便是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

(二) 根本分歧

国共两党两条不同抗战指导路线的根本分歧，就是要不要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抗战，实行人民战争路线的问题。

（三）分歧实质

两条不同抗战指导路线分歧的实质，是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属于谁的问题，它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实行我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克服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关键。

二十三、为什么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一）中日战争的基本特点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书中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

由此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1，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强国，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2，日本处于退步时代，对中国进行的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侵略战争，中国的抗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并且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已经有了无产阶级，特别是有了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3，日本是小国，人力、军力、财力、物力不足，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4，在国际上，日本是失道寡助，中国是得道多助。

（二）发展趋势

上述基本特点是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敌强我弱，决定了日本帝国主义能够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在中国横行，

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苦的道路，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能速胜。但是，敌之强，又为其小国、退步、寡助等不利因素所减杀；我之弱，又为我之大国、进步、多助等因素所补充，这又决定了日本帝国主义不可能横行到底。在战争过程中，各种因素必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尤其是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必然会向前发展，逐步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因此，最后的胜利必然属于中国。

（三）批判“亡国论”、“速胜论”

“亡国论”者夸大了敌强我弱的矛盾，把它作为全部问题的根据，“速胜论”者夸大了其他几个矛盾，根本忘记了强弱这个矛盾。这是它们在认识论上的片面性和主观性，是在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因而都是错误的。

二十四、党为什么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怎样坚持这一原则？

（一）为什么坚持

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就是在坚持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保持我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坚持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

所以必须坚持这一原则，是因为：

1.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阶级关系复杂，国民党仍坚持一党专政，而统一战线又没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纲领，

国民党企图通过统一战线限制和削弱我党及人民革命力量，因此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

2.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是建立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性的理论基础上的，是抗战时期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相互关系在党的方针政策上的客观反映。抗战时期，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降到次要的服从的地位。因此，党必须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阶级斗争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出发点，党派的独立自主应以不破裂统一战线为前提；但统一战线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放弃各党派的独立自主，就是将合作变成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丧失抗战胜利的起码条件。

3. 我们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目的，就是为了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一方面保持已经取得的阵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发展阵地，壮大人民革命力量，从而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使之成为人民的胜利。如果“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上就是一切经过和服从国民党，我党就会丧失人民革命力量，丧失抗日战争的领导权，达不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目的。因此，坚持我党的独立自主原则乃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的中心一环。

（二）怎样坚持

党在统一战线中要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对顽固派的斗争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采取“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斩而不奏”、“不斩不奏”的策略。

二十五、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主要 错误、根源及其危害

(一) 主要错误

1. 抹煞统一战线中存在的阶级差别和国共两党的本质区别。他认为统一战线中不分左中右，国共两党都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否认国民党内有法西斯势力存在，认为蒋介石是“不朽的民族英雄”、“抗战领袖”。

2. 反对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把抗战领导权拱手让给国民党。

3. 轻视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的战略作用，幻想依靠国民党的正规战取得速胜。他主张我军要在国民党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普遍的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主张进攻敌占区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他醉心于国民党统治区的合法斗争、尤其同国民党上层搞统一战线。

4. 错误地估计抗战前途。他认为国民党是“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生存而奋斗的最大政党”，抗日战争的胜利，只能是国民党的胜利，而不是人民的胜利。

5. 违反党的组织原则，把他所把持的长江局变成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独立王国，不经中央同意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文章和演说，拒绝中央的正确指示，强制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根本错误，就是只承认民族斗争而否认阶级斗争，对国民党只联合不斗争，自动放弃革命领导权，是陈独秀投降主义错误的翻版。

（二）根源

1. 客观原因是蒋介石国民党策略上的变化。除军事限共、反共外，主要采取在“朋友”字眼掩盖下的酒色逸乐等手段，拉拢、腐蚀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

2. 主观原因是王明长期拒绝世界观改造，并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党内理论发展不平衡，不少同志缺乏国共合作的经验，对王明投降主义错误抵制和斗争得不够。

（三）危害

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一九三八年王明负责的长江局工作中，在项英负责的东南局和新四军工作中，曾发生恶劣的影响，严重阻碍了长江流域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导致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的严重损失。

二十六、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是怎样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规律的？

（一）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

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阶段。”因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

统治，而不是一般地反对资本主义和私有财产制度，要建立的只能是独立的民主主义的国家，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因此，革命的第一阶段，按其社会性质，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能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革命阶段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在于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不同，联系在于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两个革命阶段必须相互衔接，中间不容许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阶段。国民党叫喊“一次革命论”，实质是取消任何革命。党内犯“左”倾错误的同志，混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界限，主张“毕其功于一役”，也只能是空想。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放弃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主张在两个革命阶段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阶段，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只有把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既区别、又联系起来，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二) 第一步只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

第一步所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因为：1.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时代里，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2. 五四运动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五四运动后，虽然资产阶级继续参加

了革命，但由于其软弱性和动摇性，已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而无产阶级已成为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重任，历史地落到无产阶级肩上。这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学说的核心思想。3.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而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其发展前途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

(三) 第二步必然是社会主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按其性质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但是，由于其政治、经济、文化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便都具有社会主义因素，并且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所以这个革命恰恰为社会主义扫清了更广阔的道路。经过新民主主义而到达社会主义，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由之路。

资产阶级企图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当时国际、国内条件下，只能是幻想。首先是帝国主义不容许，它们侵略中国的目的，绝非把中国变成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与之抗衡，而是要把中国变为它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其次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容许，而在帝国主义包围侵略下的中国，要独立解放决离不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所以在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旺盛的时代，要在反帝反封建革命胜利后，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只能是梦呓；再次，国内无产阶级和

广大劳动人民不容许，他们在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之后，绝不容许资产阶级再来统治他们。因此，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至于国民党顽固派高喊什么“基马尔主义”，实质并不是要建立什么资产阶级专政，而是企图掩盖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这只能是自寻死路。

二十七、怎样理解毛泽东思想在 抗日战争时期达到成熟？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系统地总结了北伐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深刻批判了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使毛泽东思想得以多方面展开并达到成熟。其主要标志是《〈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

1. 系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完整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和纲领。他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而现阶段的民主主义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这一理论，既批判了北伐战争时期陈独秀等人割裂两者之间联系的“二次革命论”的右倾错误，又批判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等人混淆两者之间区别的“左”倾错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总路线和政治、经济、文化纲领。

2. 深刻总结了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把它概括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的“三大法宝”。在统一战线方面，要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条件下，还要联合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的同时，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武装斗争方面，提出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以人民军队为骨干，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农村抗日根据地，进行人民战争，发展壮大人民革命力量，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燎原之势；在党的建设方面，提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与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以及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是我党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确定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党内斗争方针，并创造了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从而清除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影响，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了起来。

3. 进一步发展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理论他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外无独立内无民主，党的任务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而是先占领农村，以自己的先进思想、组织性和纪律性来提高农民群众的觉悟水平，把它变成先进的革命阵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

以上表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相应的一整套政策已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

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成熟。

二十八、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 策略总方针及其对顽固派的 斗争原则

(一) 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总方针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发展党组织和八路军、新四军，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是抗日战争的基本力量，是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基础。发展进步势力是统一战线策略总方针的中心环节；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他们往往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争取中间势力的条件是尊重他们的利益，同顽固派斗争并取得胜利；孤立顽固势力，就是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联合其尚能抗日的一面，反对其妥协投降和反共反人民的一面。反对顽固势力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不可缺少的手段。

(二) 党对顽固派斗争的原则是：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有理”，即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斗争的防御性；“有利”，即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而且要有准备、有把握地消灭来犯者，这是斗争的局部性；“有节”，即休战的原则，打退顽固派进攻后，适可而止，这是斗

斗争的暂时性。只有对顽固派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才能有效地制止其反共投降活动，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和对顽固派斗争的原则，既反对了只联合不斗争，不敢放手发展人民革命力量的右倾错误，又反对了只斗争不联合的“左”倾错误，是对马列主义策略思想的重大发展。它对于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对于击退和粉碎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保持统一战线，对于整个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十九、整风运动的内容、方针 及其重大意义

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在日、伪、顽夹击下，解放区遭到严重困难。为战胜困难，坚持抗战，党制定了十大政策，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是其中两个中心环节。一九四二年逐步开展了全党的整风运动。

（一）内容

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反对主观主义是整风运动的中心内容。主观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的根本特征是轻视实践，脱离群众，把马列经典著作的个别词句当成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生搬硬套，无的放矢；经验主义的特点是

轻视理论，把狭隘的局部的经验当作普遍真理。两者表现形式虽不同，但思想方法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以主观与客观相分裂，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为特征的。主观主义是党内产生“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当他们的认识超越于客观实际时，在政治上就表现为“左”倾机会主义；当他们的认识落后于客观实际时，在政治上又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王明等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因此毛泽东指出，主观主义是党和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这次整风运动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对教条主义，同时也反对经验主义，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表现，党八股则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表现形式。宗派主义妨碍党的统一和团结，妨碍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党八股则窒息革命精神，所以在反对主观主义的同时，也必须反对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以整顿党风和文风。

（二）方针

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个方针，既区别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方针，又区别于在党内搞自由主义的庸俗化作风，是开展党内斗争唯一正确的方针。

（三）意义

1. 整风运动是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是

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思想革命运动，也是打破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束缚，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整风运动，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空前团结和统一起来，为党的“七大”的召开，为战胜困难局面，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2. 整风运动是党的建设方面的伟大创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作出了新贡献。

3. 整风运动的内容、方针和方法，对当前执政党的建设、党的整风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十、为什么说党的“七大”是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

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的前夜，在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搏斗中，党为夺取人民抗战胜利之前途，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大会听取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总结了我国民主革命二十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大会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政治路线。

（二）大会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通过了以毛泽东思

想为全党指导思想的新党章，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空前团结。

(三) 党的“七大”制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都是正确的，它表明党已掌握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学会了领导革命的艺术，比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更加成熟，从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党的“七大”，是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的。

三十一、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 经验及其伟大意义

(一) 基本经验

1、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要战胜强大的帝国主义，必须有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先进政党来领导。这个党必须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本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制定适合本国情况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个党必须不断加强自身建设，随时准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是战胜强大敌人的根本保证。

2、必须抓住民族矛盾这个主要矛盾，正确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结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同时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执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不断巩固和扩大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这是战胜强大敌人的重要条件。

3、必须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实行人民战争，坚持持久战，实施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这样弱国就能战胜强国。

4、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联合世界上一切反对侵略的国家和力量，结成国际反帝统一战线，是战胜强大帝国主义不可缺少的条件。

总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实行人民战争，任何强大的帝国主义都是可以打败的。

(二) 抗战胜利的意义

1、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反抗帝国主义民族解放斗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完全的胜利。它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2、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亚洲各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主战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3、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弱国战胜帝国主义强国的光辉典范，它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东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革命斗争事业的发展。

附 录

【芦沟桥事变】 芦沟桥位于北平西南十五公里，是北平通往内地必经之地。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帝国主义在完成大规模入侵中国腹地的准备之后，于七月七日晚十时，借口在芦沟桥附近军事演习中一名士兵失踪，要求派部队进宛平县城搜查，当这一无理要求被拒绝后，日军遂向宛平县城和芦沟桥开炮，当地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不少官兵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史称“芦沟桥事变”。芦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铁证，也是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开始的标志。

【洛川会议】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分析了全国抗战开始以后的新形势，指出共产党同国民党的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胜利的问题，而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为此，会议决定：必须坚持抗日战争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

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洛川会议在历史的转变关头，制定了全面抗战纲领和政策，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方向。

【平型关大捷】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在林彪、聂荣臻率领下，利用晋东北平型关险要地势，出其不意地猛烈袭击日本侵略军，首战告捷，称为“平型关大捷”。当时，正值大同陷落，国民党军队狼狈溃逃，日军骄横地向雁门关、平型关一线推进，企图乘势占取太原。我军为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振奋中国人民的斗志，决定利用平型关天险，从侧翼伏击敌人。这次战役歼灭敌人主力部队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千多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品。平型关大捷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大胜利，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打乱了敌人的战略部署，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提高了我军的声威，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勇气。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要求全党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具体内容是：①全会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批判了统一战线问题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迁就主义的错误，重申了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

北，发展华中。②全会强调全党必须自上而下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③全会鉴于党内右倾投降主义分子违反组织纪律的事实和张国焘由自立伪中央发展到反党叛党的严重事件，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几个组织建设方面的文件，以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巩固党的团结统一。全会还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会后党中央决定刘少奇领导中原地区的工作。这次会议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并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规划，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第一次反共高潮的被击退】 被迫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继续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方针。一九三八年十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此后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的情况下，以国民党一九三九年一月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为标志，把政策的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由对外抗日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同年十一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定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随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甘肃省主席朱绍良策划制造了“陇东事件”，袭击我驻防宁县、镇原、正宁等县的八路军部队。阎锡山制造了“晋西事件”，命令旧军攻打新军（抗日决死队），摧残抗日民主政权，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次年二月，石友三在冀南通敌，联合日军向我进攻。三月，朱怀冰等部向太行地区八路军总部进攻，达到顶点。我党对顽固派的军事进攻早有准

备。一九三九年七月，党发表抗战两周年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九月，毛泽东在答记者问时，明确宣布我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严正立场。我军遵照中央指示，王震率领一二〇师三五九旅由华北敌后回师增援，协同肖劲光、谭政率领的留守兵团打退了朱绍良反共军的进攻，并驱逐绥德地区的何绍南部，使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联成一片。在山西，抗日决死队在八路军支援下粉碎了阎锡山的进攻，转移晋西北和太岳地区，正式编入八路军。在晋冀豫区，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奋起自卫，全歼朱怀冰部三个师，从而击退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坚持了团结抗战的局面。

【百团大战】 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五日，八路军根据朱德、彭德怀、左权签发的命令，在华北发动有一百多个团参加的“百团大战”。这次战役大小战斗一千八百多次，毙伤日伪军二万五千八百多人，破坏铁路九百四十多里，公路三千多里，车站、桥梁、隧洞二百六十多处。百团大战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打破了敌人的“囚笼政策”，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我党我军的威望，回击了国民党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无耻谰言，对稳定战局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在国际上也产生巨大影响。但是，这次战役过早地暴露了我军力量，致使日本帝国主义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决定对华北解放区实行“更大规模的报复作战”。

【皖南事变】 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何应钦、白崇禧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皓电”，对我党我军大肆造谣诬蔑，并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这是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开始。十一月九日，朱、彭、叶、项复电，驳斥国民党的荒谬命令和我党我军的诬蔑，同时为了顾全大局，表示可以将皖南新四军移到长江以北。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九千余人奉命北移，六日行至泾县茂林地区时，突遭国民党军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我军被迫抗击，血战七昼夜，终因弹尽粮绝，除约两千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遇害。十七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并声称要将叶挺交军法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这一反动暴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二十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实行反共的罪恶阴谋，提出取消十七日反动命令、惩办祸首等十二条解决办法。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在重庆也展开了猛烈的反击，揭露和抗议国民党的暴行。二十八日，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立即着手整编部队，将全军扩编为七个师，九万余人。中国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广大人民和民主党派以及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宋庆龄等人打电报怒斥蒋介石，指出：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蒋介石

集团陷于空前的孤立，不得不有所收敛，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是我党有理、有利、有节斗争策略的胜利，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彻底破产。

【大生产运动】 一九四一年开始，为了克服敌、伪、顽进攻和封锁造成的财政经济困难，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军民，遵循党中央规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鼓舞下，部队、机关、学校和广大劳动群众都投入了热火朝天的生产运动。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从一九四三年开始，敌后各解放区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的开展，战胜了严重的物质困难，改善了军民生活，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积累了经济建设经验，培养了经济工作干部，密切了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可贵的延安精神。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三十二、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 和党的方针、斗争策略

（一）抗战胜利后的形势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国内的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战后国际形势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帝国主义力量大大削弱，人民力量空前发展，出现了有利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国际条件：1、战前六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中，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被打败，英、法两国遭到严重削弱，只有美帝国主义在战争中发了横财，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空前膨胀。

2、苏联和各国人民革命力量虽然也受到严重的战争创伤。但是，苏联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东欧和亚洲新出现了一批人民民主国家，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广泛兴起，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有了新的发展。

战后国际形势的另一个基本特点是，世界仍然存在着民主与反民主，民族解放与民族压迫的激烈斗争，存在着不利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因素：1、美帝国主义凭借其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暂时优势，竭力推行反革命的全球战略，到处建立军

事基地，扶植各国反动势力，反对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妄图称霸世界，它已取代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成为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这是战后国际形势动乱的主要因素。2、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有人对美帝国主义的力量估计过高，对各国人民的力量估计过低，不敢同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进行斗争，惧怕爆发新的世界战争，片面强调各国人民同国内外反动派实行妥协，这也增加了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抗战胜利后，中国国内的情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处于空前有利的大好形势：1、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空前壮大，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一百二十万党员，领导着拥有一亿人口、一百万军队和二百万民兵的强大解放区，在沦陷区，党也组织了广大的地下武装。2、在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已不愿按国民党统治的老样子活下去，各阶层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正日益高涨；战后，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是在和平民主的基础上，建设独立富强的新中国。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革命又面临着新的困难：1、国民党在军事上还占优势，并有美帝国主义的巨大援助，在抗日战争中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蒋介石，这时，更坚持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猖狂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妄图消灭人民革命力量，在全国恢复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2、在人民中间，主要是在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中间，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对国民党的反动本性认识不清，以为美蒋反动派在战后会赐给人民和平民主，有些人害怕打内战，幻想用人民的让步来换取蒋介石的和平民主，这

种情况不能不影响到当时国内时局的发展。

上述情况表明，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大众要求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独立的新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而国民党反动派则坚持内战、独裁、卖国的政策，妄图使中国仍旧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把中国引向黑暗。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斗争。

（二）党的方针和斗争策略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时地分析了形势，确定了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策略。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八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八月二十六日，党中央向党内发出了《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其主要内容是：

1、提出了力争和平民主，准备自卫战争的方针。抗战胜利后，一方面党和毛泽东，深刻地指出，蒋介石的独裁、内战、卖国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美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把中国变成美国附庸的方针也已经定了，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此，党必须做好战争的准备，用自卫战争来粉碎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另一方面，党和毛泽东非常理解全国人民对和平、民主的迫切要求；同时，也估计到由于解放区的强大，国内人民的反对内战，国际舆论的压力，国民党自身的重重困难，经过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奋斗，限制或推迟全面内战爆发的可能性是有的，因此，我党应尽最大努力，反对和阻止内战，争取在国内出现一个和平民主发展的新阶段。如

果国民党愿意在和平条件下实现中国社会的改革，是有利于人民的。立足于准备自卫战争，力争和平民主，这就是党在新时期的正确方针。

2、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以革命两手反对反革命两手的革命斗争策略。毛泽东在总结中国人民同反动派长期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的方针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对于人民革命势力的原则是能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反动派总是以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的反革命两手来消灭革命力量，有时交叉使用一手，有时交织并用两手。对此，毛泽东强调，我们必须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蒋介石磨刀，我们也要磨刀。对于蒋介石的武装进攻，必须拿起武器和他作战；对于蒋介石的政治欺骗，必须予以揭露，决不上当。决不相信反动派的好话，也决不害怕反动派的恐吓。

3、在同美蒋反动派的斗争中，毛泽东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就是自力更生。只有把立足点放在依靠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上，依靠党和人民群众的亲密团结和政策的正确，才能打败美蒋反动派。我们需要争取外援，但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不能依赖外援。

党和毛泽东关于新时期党的方针和斗争策略的论述，使党在时局急剧变化的关头，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恰当地应付了各种复杂局面，赢得了粉碎美蒋反动派军事进攻和政治欺骗的胜利。

三十三、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为什么要争取和平民主？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的主要内容和意义是什么？

（一）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为什么要争取和平民主

抗战刚一胜利，蒋介石就按其既定方针，调兵遣将，积极抢夺人民胜利果实，加紧部署内战。但是，由于我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强大和坚决的斗争；由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和平，反对内战，加上世界舆论对和平的呼吁；由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还远在西南等地，调运到内战前线需要争取时间。于是，在美帝国主义的策划下，蒋介石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装出和平姿态，发动了和平攻势。

党和毛泽东深知美蒋反动派的阴谋。但是，考虑到全国人民对和平民主的迫切要求；考虑到人民中间的许多人，特别是中间势力对蒋介石的反动本性还认识不清，对美蒋反动派抱有幻想；同时，党也认为，如果蒋介石慑于内外的压力，内战阴谋被牵制，或者愿意在和平条件下实现一些中国的社会改革，这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为了反映全国人民的和平民主的愿望，揭露美蒋反动派的阴谋，争取中间势力和教育人民，党和毛泽东决定，在准备粉碎蒋介石军事进攻的同时，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争取和平民主，争取一切可能与国民党进行停战谈判和政治协商，以迫使蒋介石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新阶段。

（二）重庆谈判

重庆谈判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十日，我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在重庆与国民党政府进行的一次和平谈判，是党运用革命两手反对蒋介石反革命两手的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

八月十四日、二十日和二十三日，蒋介石在美国授意下，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家大计”。蒋介石的诡计是：1、如果毛泽东不去，就嫁祸于人，把内战责任加在共产党身上；2、如果去了，他想威逼利诱我交出军队和政权；3、即使谈判不成，也可麻痹我们，争取时间，加紧运兵，部署内战。在此期间，斯大林也致电中共中央，说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要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党中央为了力争和平民主和揭露蒋介石的真面目，在八月二十五日发出的《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高举和平民主的旗帜，明确地提出了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的方针。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谈判，充分表现了党谋求和平民主的诚意，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蒋介石对谈判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由我党提出。谈判斗争的焦点集中在军队和政权问题。国民党妄图在“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我党则把坚定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一方面坚决拒绝其无理要求；另一方面也作了必要的让步，提出军队问题，在实现政治民主化之前，可先行整编，国共两党军队可按七比一的比例，缩编下来。解放区政权问题，在承认解放区政府前提下，我愿退出南方八个解放区，部队撤至长江以北。重庆的政治

谈判，还同战场上的军事斗争相交织。就在谈判期间，蒋介石令其军队向解放区大规模进攻，企图压我在谈判桌上屈服。我军奋起自卫，击退沿平绥路进攻的傅作义部，在上党战役中，一举歼灭阎锡山部三万五千人，有力地打击了蒋介石的内战气焰，支援了重庆的谈判斗争。

经过四十三天谈判，十月十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被迫表示同意我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坚决避免内战，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并允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拒不承认解放区的人民政权和人民军队的合法地位。重庆谈判，虽然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但它表明了我党争取和平的诚意，从而教育了人民，特别是中间势力，使我党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暴露了蒋介石的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国民党陷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三）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政治协商会议是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至三十一日，在重庆由国共两党、其他党派和社会贤达代表参加的一次各党派协商国事的会议，是我党争取和平民主的又一次重大斗争。

重庆谈判后，国民党军队变本加厉地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十月下旬至十一月初，我军在平汉路上取得邯郸战役的胜利，整个战役歼敌四万余人。这次战役打乱了国民党的内战日程，推迟了国民党迅速进占华北和东北的计划。与此同时，国统区爆发了以“一二一”学生运动为主的反内战运动，许多民主党派、团体和民主人士反对国民党独裁内战的斗争更加活跃。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连遭失败之后，发现他们要进行大

规模内战，还远未准备好，感到需要继续玩弄政治欺骗。美国政府鉴于援蒋内战政策的破产，也假意表示赞成中国召开主要政党代表会议，并派马歇尔来华“调处”内战。十二月二十七日，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公报也表示不赞成中国内战，认为国民政府各级机构应有民主党派的广泛参加。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被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参加政协的除国共两党外，还有民主同盟、无党派人士、青年党，代表左、中、右三种势力。我党参加会议的代表有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会议的斗争焦点仍然集中在军队和政权问题。

1、关于军队问题，国民党坚持先军队国家化，然后政治民主化，就是“你先交出军队，我再给你民主”，企图以民主为诱饵，骗取我党交出军队。中间派抱有幻想，他们要求共产党在军事上作些让步，国民党在政治上作些让步，有的还主张国共双方都交出军队，由他们代表国家来掌管。中国共产党主张，军队国家化的根本原则是国家民主化和军队民主化，前提是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国共双方同时交出军队。

2. 关于政权问题，国民党坚持它的一党专政、个人独裁，只同意扩大政府，吸收其他党派几名代表去作官，装璜门面，以此诱骗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中间派许多人士关心的是什么国会制、内阁制，想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主张，成立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召集真正的国民大会，制定民主的宪法，并实行地方自治，民选省长，以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保障解放区民主体权。

在我党代表和其他民主人士的努力下，一月三十一日，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国民大会、和平建国纲领、宪法草案、军事问题等五项决议。关于军队问题，仅规定了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以政治军的原则，确定全国军队进行整编。关于政权问题，确定改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政府，提高国府委员会的职权，修改国民党宪法中的中央集权制和总统制，保障人民权利和中央机构分权制、中央与地方分权制。这些决议虽然与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有相当距离，但它在不同程度上贯彻了和平民主的根本原则，否定了国民党的独裁内战政策，是有利于人民，不利于国民党反动派的。

三十四、怎样理解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党关于粉碎国民党军事进攻的政治方针和军事原则是什么？

（一）怎样理解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蒋介石在完成了内战准备之后，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挑起了空前规模的全国性内战。

战争初期，国民党在军事上、经济上都占有优势。它拥有总兵力四百三十万人，统治着三亿以上人口的地区，控制着全国的大城市和绝大部分交通线，接收了日军一百万人投降的装备，又有美帝国主义的巨大援助。蒋介石曾狂妄地宣称，只须三个月至六个月，就可以打败人民解放军。

当时，人民解放军只有一百二十万人，装备是小米加步

枪，解放区才一亿三千多万人口，被分割在十几块根据地，封建势力还没肃清，解放区基本上没有外援。人民革命力量，显然处于劣势。

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敢不敢进行革命战争？能不能打败敌人的进攻？这是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一个严重问题。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党和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坚定地指出：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蒋介石。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因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一个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反革命战争，如果我们表示软弱和退让，不敢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中国就将变成黑暗世界，民族前途将被断送。我们能够打败蒋介石，因为蒋介石虽有美援，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援，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

为了进一步从理论上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回答如何估量敌我力量，认识战争的胜败问题，一九四六年八月，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其主要内容是：

1. 毛泽东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因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创造和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大力量是人民群众，而不是反动派。从本质上看，一切反动派只代表反动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势力，阻碍着社会的向前发展，并与人民为敌。而没有人民支持的事业是没有生命力的，与

人民为敌的反动派则必将被人民所击败。

2. 毛泽东指出：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尽管一切反动派在它们的历史上升时期势强有力，是真老虎，但当它们走上历史下坡路，当它们的对立面——人民，逐步壮大起来斗争时，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纸老虎。尽管这时它们还有真老虎和吃人的一面，人民事业的发展也总要经历许多困难和曲折，但反动派是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是总有一天要胜利的。

3. 毛泽东认为，把一切反动派看做是纸老虎，这是从战略上说的，是革命人民的一个根本战略思想。革命者必须在战略上，在全体上，藐视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但同时，在战术上，在策略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要重视敌人，善于斗争，讲究斗争艺术，一步一步地消灭敌人。

毛泽东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有力地武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坚定了革命人民战胜美蒋反动派的胜利信心。

（二）党粉碎国民党进攻的政治方针和军事原则

一九四六年七月和九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为中央军委起草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指示中，提出了打败国民党进攻的政治方针和军事原则。

1. 政治方针，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建立最广泛的反对美蒋反动派的革命统一战线。为此，（1）在农村中，要坚定的解决土地

问题，紧紧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对其他阶级和阶层应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以减少敌对分子，使解放区得到巩固。(2)在城市中，除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小资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分子外，应注意团结一切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3)在国民党军队中，应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

2. 军事原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实现这一作战原则的要求是：(1)在作战方法上一般地是运动战，我军应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党中央及时地提出了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转变问题，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2)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是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3)在战役和战术的部署上，必须集中六倍、五倍、四倍于敌，至少也是三倍于敌的绝对优势兵力，选择敌人较薄弱的一路包围歼灭之，然后扩大战果，以求全歼和速决。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我军战胜蒋介石军事进攻的根本作战方法。只有这样，在全局上暂时处于劣势的我军，才能保证在局部上的优势，取得战役战斗的胜利，才能使我军逐步积小胜为大胜，由局部优势发展为全局优势，从而根本扭转战局，直到最后战胜敌人。

三十五、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 哪些爱国民主运动？我党是怎样 领导白区工作和地下斗争的？

解放战争时期，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不断高涨，形成了配合人民解放军正面作战的第二条战线，推动了人民大革命的胜利发展。这个时期党领导的白区工作和地下斗争，是正确的，成功的，为夺取全国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发生的爱国民主运动

1. 一二一运动。一九四五年末，在昆明发生的一二一运动，是抗战胜利后到内战爆发前，国统区人民在我党的领导下，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争取和平民主的一次群众运动。

一九四五年十月，蒋介石违背《双十协定》，调动八十万军队进攻解放区，内战规模日趋扩大。十一月五日，党中央发出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十一月十九日，重庆各界代表组成反内战联合会。十一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领导和组织下，昆明大中学生六千余人在西南联大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遭国民党军警骚扰破坏，各校学生于次日联合罢课。十二月一日，昆明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警特务，武装镇压屠杀罢课师生，死四人，重伤二十余人，制造了一二一惨案。惨案发生后，激怒了广大人民群众，昆明、重庆、上海等地各界人士举行隆重的公祭，仅昆明一地就有十五万人参加了公祭，占全市人口之半，全

国各大城市学生纷纷提出抗议和进行示威游行。昆明学生罢课达一个月之久，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巨大声援，一个以学生运动为主的反内战运动，席卷了整个国统区。周恩来当时高度评价昆明学生的斗争，是新的“一二九”。

一二一运动是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高涨的开端，它有力地揭露了蒋介石的内战阴谋，配合了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2. 上海的摊贩斗争和抗议美军暴行运动

全国内战爆发后，随着国统区的日益殖民地化，蒋介石在政治上的残暴统治和经济上的压榨掠夺，使国统区人民经常处于饥饿和死亡线上。为了生存自救，从一九四六年末开始，各阶层人民的斗争迅速发展起来。

上海的摊贩斗争。一九四六年七月，国民党政府以“妨碍市容”为名，下令取缔上海的摊贩。十一月三十日，为反抗国民党不准营业，摊贩三千人举行请愿游行，遭国民党当局镇压，死七人，受伤、被捕者甚多。十二月一日，摊贩继续进行斗争，又被武装军警杀害十人，伤百余人，激起摊贩更强烈的反抗，斗争队伍增至五千余人。全市商店也停业声援，形成全市性的反蒋群众运动。

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北平发生了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的暴行事件，激起广大学生和人民的强烈愤慨。三十日，北平学生万余人举行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撤出中国的示威游行。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指出北平的抗暴行动是“爱国运动”，要“造成最广泛的阵容”，“使此运动向孤立美蒋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之

途展开”。从十二月底到一九四七年三月，全国各大中城市，参加抗暴运动的学生达五十多万人。抗暴运动持续三个月之久，比“一二一运动”更深入，更广泛，标志着国统区人民爱国民主运动的新高涨。

与此同时，农村的广大农民，为反抗国民党的抓丁、征粮，掀起了规模巨大的民变运动。在城镇的广大贫苦人民，为了要饭吃，求活命，被迫发生了抢米风潮。不堪失业、贫困的上海工人，掀起了争取解冻生活指数（国民党不管物价如何飞涨，工人工资只能按固定指数计算）的斗争。

3.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一九四七年五月，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在国统区人民争生存的浪潮中，在我党的领导下，学生界继“抗暴”运动之后，又发动了震撼全国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并逐步形成了反对蒋介石统治的第二条战线。

由于国民党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的加深，教育危机也日趋严重。广大师生对国民党的教育经费奇缺，教育制度腐败，党棍治校，特务横行，早就强烈不满。五月四日，上海学生上街进行反对内战的宣传示威，提出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的口号，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各校学生立即罢课抗议示威，揭开了斗争序幕。运动迅速扩展到其他城市，南京的学生举行罢课请愿，北平、天津的学生为反饥饿、反内战相继罢课游行，并成立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二十日，华北、南京、上海等地学生分别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大游行，汇合成全国学生运动的高潮。在北平七千多学生的游行，得到广大市民和工人的热烈支持。在南京、平、

沪、苏、杭地区十六个专科以上学校六千多学生举行联合大游行，提出挽救教育危机的五项要求，遭国民党军警野蛮镇压殴打，受伤百余人，被捕二十余人，造成震惊全国的“五二〇血案”。但是，学生运动并未被暴力所压倒，自五月到六月，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扩大到国统区六十多个大中城市，并发展为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教师罢教的广泛的爱国民主运动，形成了配合人民解放军正面作战的第二条战线，使蒋介石处于全民包围之中。

一九四七年七月，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国民党反动派加强了对爱国民主运动的镇压。十月二十九日，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引起了学生反迫害争自由运动的高涨，全国各大中城市学生参加罢课、抗议和追悼活动的有十万人。一九四八年一月，国民党军警殴打逮捕上海同济大学反压迫请愿的学生。二月，上海申新九厂七千余工人，为反抗厂方无理经济剋扣和解雇工人举行总罢工，国民党军警特务用装甲车、机枪残酷屠杀，制造了“申九惨案”。三、四月，国统区的反迫害反饥饿斗争又出现新的高潮。

（二）我党是怎样领导白区工作和地下斗争的

1. 党中央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规定了正确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如一九四七年春，中国革命即将出现新的高潮，党中央指出：（1）针对蒋介石的镇压政策，我们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2）我在大城市的工作方针，就是要保

护我党及民主进步力量，加紧开展人民运动；（3）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将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区别又结合，使群众斗争沿着开辟国统区第二战场的方向前进。又如，一九四八年八月，针对蒋介石临近崩溃，决心对人民实行疯狂的镇压和屠杀的情况，党中央及时发出斗争要有清醒头脑和灵活策略的指示。（1）党在国民党区的工作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2）在城市方面，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为配合解放和接管城市进行准备工作。

2. 加强组织领导。如一九四七年四月，党中央确定设立中央城市工作部，各中央局、分局和有关区党委均设城工部。在国民党统治区，以上海局和香港分局分别管辖有关地区党的工作，这就加强和统一了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领导。

三十六、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经济纲领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在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党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所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明确提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

（一）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

1、旧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封建的土地占有制度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落后的总根源，是我们国家

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是我们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条件。

2、党的土改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在土改中必须注意两条基本原则：第一，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第二，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

(二) 没收四大家族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它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结合，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在中国的通俗名称，也叫做官僚资本。它除有一般垄断资本的腐朽性外，还有很大封建性、买办性，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阻碍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没收四大家族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消灭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社会生产力。

(三) 保护民族工商业

1. 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同官僚资本主义工商业不同，必须严格区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两个部分。上层小资产

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没有联系，或者联系较少，可以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或者保守中立，是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对于这些阶级，必须坚决地给以保护。

2.对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反动政治倾向应进行揭露和打击，但是，政治上的打击和经济上的消灭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在经济上必须一律采取保护政策。

3.在全国革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也必须允许民族工商业存在，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还可以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是新中国经济构成的一种形式。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三十七、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是怎样开展的？党是怎样论述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以及纠正土改工作中“左”倾错误的？

（一）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是怎样开展的

1.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随着国民党军事进攻的扩大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地主阶级更加反动，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土地改革。党中央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及时地将抗战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明确指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环节，必须放

手发动和领导目前的群众运动，开展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等斗争，以获得土地；并规定了不可侵犯中农土地，对富农和地主、地主的大中小、恶霸非恶霸应有所区别，保护工商业，对开明绅士照顾等正确政策。各解放区根据这一指示，迅速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四七年二月，全解放区已有三分之二的地区，解决了土地问题，六千万以上的贫苦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从而提高了农民的革命热情和 生产 积极性，掀起了参军参战的热潮，极大地巩固了解放区和加强了对解放战争的支援。

2、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英勇奋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革命战争的猛烈发展，要求解放区普遍地彻底地实行土地改革，以进一步动员广大农民支援革命战争。七月至九月，党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总结了《五四指示》发布后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经验，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制度；没收地主的一切土地和财产，征收富农的多余土地和财产，按人口平均分配。富农之所以按照平分原则将多余的土地和财产拿出来分配，是因为中国的富农一般地带有 很重的封建和半封建剥削的性质，在当时激烈战争的情况下，富农在政治上 是倾向于地主阶级和蒋介石一边，反对土地改革和人民革命战争的，他们占有土地数量较多，质量较好，不平分则不能满足贫雇农的要求。这次会议，着重批评了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去努力满足贫苦农民土地要求的右倾错误，这是必要的。但是，对前一段土改中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缺乏注意，对某些地区土改不

够彻底和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的情况估计过于严重，因而使“左”倾错误进一步得到发展。

全国土地会议后，各解放区都抽调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土地法大纲颁布后的一年内，解放区有一亿农民获得了土地，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使革命战争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物力，为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和战略决战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但是，在土地改革及其他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左”的错误倾向。土改工作中“左”的倾向的主要表现是扩大打击面，侵犯中农利益，侵犯属于地主、富农的工商业，对待地主和富农没有区别，对待地主的大中小、恶霸和非恶霸没有区别，发生乱打乱杀的现象等等。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新解放区的不断扩大，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彻底纠正一些“左”的偏向，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党关于正确执行政策的指示和对土改工作中“左”倾错误的纠正

为了纠正土改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从一九四七年底到一九四八年春，党中央先后多次发出了指示。一九四八年一月，任弼时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四月，毛泽东发表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这些指示和讲话的主要内容是：

1、强调了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指出，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在政策问题上，如果犯了原则错误，不加

改正，革命就会失败。“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因为，敌人的孤立，并不等于群众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的提高，并不等于中间阶级对党和革命的靠拢，也不等于敌人放弃顽抗和垂死挣扎。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走上正轨，才能有效地发动和组织群众，最大限度地争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有力地打击和消灭敌人。

2. 强调全党同志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必须明确：(1) 这个革命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不能由别的阶级和政党领导；(2) 参加这个革命的人们所组成的统一战线是十分广大的，除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外，还包括了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地主阶级分裂出来的一部分开明绅士；(3) 革命所要推翻的敌人，只是和必须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不能扩及其他。只有这样，才能在执行具体政策时，保持清醒头脑，不迷失方向，不左右摇摆。

3. 对土地改革的具体政策作了系统的阐述和明确的规定。党的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就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为此，(1) 必须把贫雇农的利益和带头作用放在第一位，但不是由贫雇农包办一切，“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2) 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政策，要纠正错定成分和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3) 必须缩小打击面，

土改的对象，人数甚少，一般不超过农村户数的百分之八，能参加土地改革统一战线的户数，应在百分之九十以上；(4)必须区别地主和富农、地主的大中小、恶霸和非恶霸；(5)对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一般的应予保护；(6)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7)不同地区的土地改革要采取不同的策略，有步骤分阶段进行，避免操之过急，不切实际。

一九四八年上半年，经过各级党组织的努力，“左”的倾向迅速得到纠正，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土地改革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从而为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可靠保证。

三十八、一九四九年初，我党为什么提出 “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一九 四九年国共和平谈判的经过和意 义是什么？

(一) 一九四九年初，我党为什么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

一九四八年秋冬，在人民解放军三大战役的凌厉攻势下，国民党反动派统治面临覆灭的绝境。军事上连遭惨败，只剩下一百几十万军队；政治上众叛亲离，国统区人民正在大批地转到革命阵营方面来；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想逼蒋介石下台。美蒋反动派为了进行垂死挣扎，一面组织军事力量进行顽抗，一面又玩弄新的和谈阴谋，一再策划“划江而治”，妄图争取时间，卷土重来。

他们还企图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使革命就此止步。当时，自称为人民朋友的一些资产阶级右翼人士，也散布和平妥协思想，说不可再用革命武力，“不可除恶务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有人不赞成我们打过长江。

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问题尖锐地提出来了。为了揭露美蒋反动派的新的和平阴谋，批判资产阶级右翼的和平妥协思想，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中，及时地提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其主要内容是：

1.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一切善良的愿望改变不了他们阶级本性的一分一厘一丝一毫。

2. 只有将革命进行到底，即只有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打倒三大敌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共和国，中国才能独立、和平、民主，才能造成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使革命半途而废，中国就将回到黑暗世界。

3. 一切革命的人民的人民的朋友，应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坚决彻底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

（二）一九四九年的国共和平谈判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蒋介石在内外矛盾交困的情况下，发表一篇求和的声明，要求保存伪宪法、伪法统，保存

他的命根子——反动军队，否则他就要和共产党周旋到底，实行决战。这是一个搞假和平的阴谋，实际是一场新的“和平攻势”。十四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消灭反动势力，真正谋求和平的八项条件。是将革命进行到底，消灭反动势力，实现真和平的条件。二十一日，蒋介石在和谈阴谋被揭穿，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全部被歼的情况下，被迫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但各方面实权仍操在蒋介石手中。李宗仁上台后，表面上愿以我党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实际是想在美国支持下稳住国民党的阵脚，发展自己的局面，实现两分天下，“划江而治”。推动这次谈判的主要力量是桂系军阀、国民党内主和派和上海资产阶级。

我党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根本原则，但并不拒绝一切和谈。为了缩短战争时间，减少战争破坏，凡是对人民有利的和谈，我党是随时争取的，条件是完全承认八条。做为交换条件，我们准备对桂系、其他国民党主和派和南方资产阶级的某些利益给以照顾和保护。

四月一日，我党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京正式谈判。十五日，双方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但南京政府拒绝在协定上签字。至此，国民党的和平骗局全部暴露。

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军即以排山倒海之势，强渡长江天险，二十三日，解放南京，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遂告覆灭。

三十九、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 主要内容及其意义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夜，党中央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向全会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会议着重讨论了这个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一）会议的主要内容

1、提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迅速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1）根据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队主力已基本被消灭的形势，会议认为，今后解决国民党残余军队问题，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形式。用战斗去解决敌人的天津方式，仍然是首先必须注意和准备的。同时，要学会用和平改编敌人的北平方式和暂时不动以后改编敌人的绥远方式。后两种虽然暂时保留一些反革命的遗迹和影响，但归根到底要被肃清。（2）会议指出，人民解放军将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又是一个工作队，要加强工作队的作用，以适应新区干部不足和革命事业发展的需要。

2、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

会议指出，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1）在城市工作中，党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如果我们不能很快地学会

管理生产的工作，迅速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就不能维持政权。同时，我们也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各方面敌人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不然，也不能维持政权。（2）在城市斗争中，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一切可以同我们合作的人，去战胜敌人和进行建设事业。（3）城市的生产，首先是国营工业的生产，其次是私人工业生产，再次是手工业生产。

3、阐述了全国胜利后国内外的基本矛盾和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

会议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国内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党的任务就是要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此，全会规定了党在各方面的基本政策。

在政治方面，（1）必须强化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2）党必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农民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同时，也要团结尽可能多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要坚持与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

在经济方面，会议分析了旧中国经济的基本特点是：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只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则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战略、策略和政策上的问题。（1）对于在现代工业中占第一位的官僚

资本，必须没收归国家所有，使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2)对于在现代工业中占第二位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既要利用它的积极性以利于发展国民经济，又要从各方面采取恰如其分的限制政策；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3)对于占国民经济百分之九十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应逐步地积极引导它们经过合作社的形式，向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4)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将是新民主主义的五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通过合作社经济改造个体经济，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将是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途径。(5)中国经济的发展将有较高的速度，只有经济上的极大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才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外交方面，(1)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保护普通外侨的合法利益。(2)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3)既要同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4、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

(1)会议分析了革命胜利后思想战线的形势。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功臣自居、停顿不前、贪图享乐的情绪可能生长，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有些意志薄弱者，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2)会议强调，夺取全国

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为此，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和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以防止资产阶级腐蚀和为个人歌功颂德。

（二）会议的意义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确定了明确的方针政策，为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夺取民主革命胜利，实现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以及在胜利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四十、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的主要内容及其意义

随着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胜利、南京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覆灭，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新中国的条件已经成熟。为了阐明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问题上的基本主张，澄清和批判各种错误思想，回击敌人的恶毒攻击，毛泽东于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

（一）《论人民民主专政》的主要内容

1、论述了在中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必然性。文章深刻地总结了近百年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指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只能建立工

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共和国，而不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历史已经证明，在帝国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2、阐明了各阶级在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1）人民民主专政必须由工人阶级来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彻底性。（2）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主要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不论是革命，或是建设，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力量。（3）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有其重要性，必须团结他们对付帝国主义，发展我国的经济，巩固人民政权，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

3、说明了人民民主专政是对人民内部的民主和对反动派专政两个方面的结合。（1）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对于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权选举自己的政府，组成自己的国家；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对反动派则实行专政，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2）对人民的民主，对反动派的专政，这二者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只有民主和专政的结合，才能实行对反动派的有效专政，才能

保障人民的充分民主。

4、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主要任务。(1) 由于帝国主义、国内反动派和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要加强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2)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必须学会经济工作。(3) 必须逐步地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需要很长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4) 人民的国家必须用民主的方法，教育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5、阐明了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必须联合国际革命力量，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奋斗，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由于当时帝国主义敌视中国革命，社会主义苏联援助我们，我们必须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取得国际革命力量的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干涉和侵略。

(二)《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意义

《论人民民主专政》是一篇重要的文献，它集中地说明了党关于建立新中国的政治主张，奠定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文章提出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在我国条件下，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又在联合中逐步消灭这一阶级，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它

保证了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一大贡献。

四十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的基本经验和伟大意义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期英勇斗争的结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其主要经验是：

1、必须有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这个党必须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深刻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制定和贯彻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这个党必须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2、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建设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强大的人民军队，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路线；必须以农村为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必须使其他各种形式的斗争与武装斗争相配合。

3、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坚决依靠农民这个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对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在国际上，必须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

础上，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二)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意义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1、在国内，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它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的反动统治，宣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从此，中国进入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新的历史时期。

2、在国际上，是继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又一次伟大的胜利。它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制度，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激励了亚、非、拉美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对国际局势和世界人民斗争的发展，具有深刻的、长远的影响。

附 录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国民党反动派企图侵吞人民胜利果实，在全国推行其独裁统治，一面积极准备发动内战，一面又假装和平谈判。我党为保卫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争取和平民主，由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同时，为准备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促成和平谈判的成功，根据当时形势，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向北发展”，就是全部控制热、察两省，力争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向南防御”，就是收缩战线，集中力量，阻止顽军进入东北、热察，准备对付国民党的的大举进攻。向南防御是保障向北发展的重要措施。

为了贯彻这一方针，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措施。1、加强对东北地区的领导，抽调主力部队迅速进入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2、保卫以张家口为中心的战略基地，成立冀热辽中央局。3.撤出南方八个解放区，收缩战线，调整部署。4、在津浦、平汉、同蒲和平绥路沿线，阻

止蒋军北进，掩护我军向北展开。5、改组野战部队，应付蒋军进攻。

【停战协定】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达重庆，准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十二月下旬，周恩来代表我方向国民党正式提出，停止军事冲突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前提条件，必须立即无条件的全面的停止内战，并向美国特使马歇尔表明了我党对于停战谈判的基本态度。在我方的催促下，从二十七日起，由我党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和国民党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以及马歇尔参加，举行停止军事冲突的谈判。一月五日，国共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一月十日，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的协议。规定除东北地区外，全国各地一律于一月十三日午夜前停止军事冲突和军事调动。协议还规定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停战协定的实施。

中国共产党认真履行这一协定，一月十日晚，毛泽东向解放区各部队发布了严格执行停战协定的命令。国民党还在谈判中，就在美国授意下，坚持东北不在停战范围之内，以便先在东北放手大打，然后再将战火转向关内。一月十日，蒋介石在下停战令同时，向国民党部队下达了“抢占战略要点”的密令，接着又不断调动军队进攻解放区，肆意破坏停战协定。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按照党中央关于举行全国性反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方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鲁西南强渡黄河，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八月上旬，在歼敌九个半旅

之后，向大别山地区实行无后方的千里跃进，八月底到达。刘邓大军与挺进豫西的陈谢大军、挺进豫皖苏地区的陈粟大军互为犄角，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从根本上撼动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使解放战争达到了一个转折点。

【一九四七年党的十二月会议】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所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对革命战争转入进攻后，党需要解决的军事、土改、整党、经济政策、统一战线等一系列问题作了纲领性的说明。在军事方面，提出了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核心的十大军事原则；在土改方面，阐明了“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的方针；在经济方面，规定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经济纲领；在政治方面，重申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纲领。十二月会议，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政策上的充分准备。

【一九四七年的整党整军运动】 一九四七年冬，全党结合土改，开展了着重解决党内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为目的的整党运动。主要内容是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经过整党纯洁了党的

队伍，提高了党员的政治觉悟，端正了作风，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一九四七年冬至一九四八年春，人民解放军利用战争空隙，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方法，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这一运动进一步发扬了部队的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极大地提高了我军的政治素质，增强了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和战斗力。

【三大战役】 一九四八年秋，党中央和毛泽东纵观全局，抓住战机，决定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战略决战。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四个月零十九天，歼敌一百五十四万余人，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的主力，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大大加快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1）辽沈战役。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至十一月二日，由东北人民解放军七十余人发动的一次巨大战役。国民党在东北总兵力是四十八万，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地区。我军主攻方向指向哪里，是战役指导的关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制定了主力南下北宁线，攻克锦州，把敌人关在东北地区歼灭的作战方针，纠正了林彪在攻锦打援问题上的犹豫动摇。战役分三个阶段：解放锦州与长春；辽西会战，围歼廖耀湘兵团；解放沈阳、营口。整个战役歼敌四十七万人，解放了东北全境，并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

（2）淮海战役。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由华东、中原野战军和地方部队共同进行的一次

决定性战役，我军共六十余人参加。当时，华东战场的敌人，连同后赶来的黄维兵团近八十万人。敌人采取一点两线、重点密集的部署。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认为，若攻其一点，必须拦得住敌人援兵，才能赢得时间，保持主动。战役经三个阶段：歼灭黄伯韬兵团；围歼黄维兵团；全歼杜聿明兵团。这次战役共歼敌五十五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使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和上海、武汉处于我直接威胁之下。

（3）平津战役。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五日至翌年一月三十一日，由华北、东北野战军共一百万人协同进行。当时，敌人已成惊弓之鸟，六十余万兵力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塘古等地一线摆开。如何不让敌人逃跑，就地歼灭，便成了指导这次战役的关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采取了东北人民解放军不进行休整，迅速秘密入关，出敌不意，对敌实行战略大迂回，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的办法，待完成部署后再各个歼灭。整个战役分三个阶段：分割包围，封闭敌人逃路；先打两头，孤立中间，解放天津；和平解放北平。共歼灭和改编敌五十二万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

三大战役之所以取得伟大胜利的主要原因是：①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正确指导；②我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作战，奋不顾身，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③解放区人民的全力支援。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四十二、党是怎样领导全国人民 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 会主义转变的？

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主要是指社会制度的转变，它是通过革命的转变来实现的。

（一）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和毛泽东就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思想，即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把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推进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然后再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三大敌人反动统治的覆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我国进入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新的历史时期。

新民主主义社会之所以必然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主要是由于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正确领导，在建国时：
1. 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

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和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这是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政治方面的社会主义优势。2.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已建立起包括有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在内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和它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这是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经济方面的社会主义因素。3.建国后，党和国家的纲领、路线和政策的出发点，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和斗争，就是要使我国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有步骤地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奠定我国社会主义的基础。这些，就为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准备了基本条件。

（二）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是通过不断扩大社会主义经济和逐步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的。

1.建国后头三年，党先集中主要力量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同时，开始部分的、初步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建国初期，国内的形势错综复杂。（1）人民解放战争虽然已经取得了基本胜利，但尚未结束；（2）人民民主政权已经建立，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尚需建立和巩固；（3）在新解放区，社会秩序尚未稳定，反革命残余势力还相当猖獗；（4）官僚资本还未全部没收，在城市和工矿企业中，民主改革尚

未开展；(5)土地改革在三亿多人口的新解放区尚未进行；

(6)美帝国主义还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因此，中国人民同三大敌人的矛盾尚未彻底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中国人民同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但与此同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也已开始上升。因此，建国初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建立、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未完成的任务，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为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全面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条件。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二年，我党的主要工作是：①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②完成了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③统一财经，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等等。这就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和改造国民经济打下了基础。到一九五二年底，中国人民同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解决，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得到了根本好转，工农业生产达到或超过解放前最高水平。我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八百二十七亿二千万，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七点五，较历史上最高水平的一九三六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一百四十五，农业总产值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四十八点五。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已胜利完成。

2. 从一九五三年开始，我国进入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进一步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党及时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为全国人民

民指明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具体途径。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面展开，进一步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在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同时，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使我国的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达百分之九十三，非社会主义经济只占百分之七左右。我们基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同时，改造了小生产的私有制度，我国基本上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标志着我国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使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得以实现。

四十三、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 主要内容及其意义

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至九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

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还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刘少奇、陈云、周恩来、聂荣臻分别作了土改、财经、外交、统战和军事方面的报告。

（一）会议的主要内容

1. 提出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2. 规定了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三个条件：第一，完成土地改革，是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最基本的条件。只有实行土地改革，才能提高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农村生产力，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逐步改善农民生活，并为国家提供较多的粮食和原料，为工业化开辟道路。第二，合理调整工商业，是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一个重要条件。要按照统筹兼顾的方针，合理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第三，大量节减国家机构所需的经费，也是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重要条件。只有厉行节约，减少非生产性开支，才能把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用在发展工农业生产上。

3. 为了实现上述三个条件，报告规定了必须做好的八项工作：（1）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2）在巩固财政经济统一和稳定物价的方针下，调整税收，减轻人民负担。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合理调整现有工商业；（3）整编行政机构，复员一部分军队；（4）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文化教育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5）认真做好失业救济工作；（6）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7）坚决肃清一切反革命；（8）加强党的建设，进行全党的整风运动。

4. 正确地制定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战略策略方针。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孤立敌人，壮大自己，是毛泽东的一贯思

想。结合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毛泽东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孤立和打击主要敌人，绝不可树敌太多。在当前，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还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毛泽东反复强调对各项工作和各项改革，必须采取谨慎稳妥的态度。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以集中力量，向国民党残余势力，封建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进攻。

（二）七届三中全会的意义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是党在建国初期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正确地制定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的工作纲领和战略策略方针，确定了党的一系列具体任务和政策，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对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困难，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彻底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迅速恢复国民经济，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十四、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 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成就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二年底，在党的正确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全国人民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在各条战线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1. 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

到一九五二年九月，全国各省、市、县、乡(村)都建立了人民政府，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作为国家的基本制度的人民代表会议，已经在全国范围内从上而下地建立起来。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

2. 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

(1)工农业生产超过了历史的最高水平。到一九五二年底，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七点五，比历史最高水平的一九三六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一百四十五，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四十八点五。钢、煤、电、原油、棉花、粮食等，都有较大增长。交通运输事业也得到恢复和发展。

(2)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主义经济力量大大加强。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二年，国营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百分之三十四点七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六，公私合营和加工订货从百分之九点五上升到百分之二十六点九。

3. 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巨大发展。

一九五二年全国学生总数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一倍多。卫生、体育、文艺、新闻出版及科学研究等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4. 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显著改善

全国职工人数，一九五二年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七点五。全国工人的平均工资收入已达到或超过抗日战争以前的水平。农民的生活状况，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和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也有明显的改善。

5. 在外交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

到一九五二年底，已有几十个国家相继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十几个国家先后承认我国，还有许多国家和地区同我国建立了通商贸易关系。

（二）基本经验

三年来，我国所以能够取得辉煌的成绩，是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并且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英勇奋斗的结果。主要的经验有以下几点：

1. 党坚持了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基本原则和优良传统。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党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党从旧中国的经济十分落后，现代工业只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一基本实际出发，制定了党的战略、策略和政策。在党的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要进一步认清和把握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批评了那种急于消灭资本主义的“左”倾思想。

2. 坚持以发展生产为中心，正确处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建国初期，党紧紧抓住了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一中心环节。强调各项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革都要服务于这一中心，正确处理了政治和经济、革命和建设的关系，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抗美援朝开始后，党及时提出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在国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每一步都坚持以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为出发点。

3. 党制定了正确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在建国以后，党从实际出发，提出了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并且坚

持了团结多数，孤立和打击最主要之敌的“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方针，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各项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如在同民族资产阶级关系和统战工作方面，提出了“有所不同，一视同仁”的方针，以利用、限制为主，同时开始改造；在镇反运动中，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土改中，提出由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等等。正是由于我们党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正确处理了各方面的关系，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使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4. 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民主革命胜利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执政党的建设，对于保证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恢复时期，党用极大的精力，抓紧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结合中心工作，开展了整顿党的作风和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运动，通过整风和整党，纯洁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广大新老党员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使绝大多数党员在胜利条件下，继续保持和发扬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使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同心同德，艰苦努力，保证了党在恢复时期各项任务的胜利完成。

四十五、为什么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一九五二年，党中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

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反映了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一）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我国的工业生产十分落后，一九五二年，钢的年产量只有一百三十多万吨，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标志的现代工业，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七。我们还不能制造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和重型的精密的机器，还没有现代化的国防工业，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毛泽东曾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只有现实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这样，才能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才能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才能保证逐步完成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的改造，才能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因此，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就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在新的历史阶段所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这是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物质基础。

（二）随着土地制度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在全国的完成，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其主要表现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性和盲目经营，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要求相矛盾；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存在，与国家对个体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相矛盾；资本主义工商业内部职

工与资本家的矛盾日益突出；资本主义剥削与扩大社会主义积累之间的矛盾更加明显，等等。这些矛盾的发展，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日益成为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只有从根本上改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把原来落后、混乱、畸形发展，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引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否则，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会遭到破坏，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会无法实现。

（三）土地改革后在我国农村大量存在的个体经济，是一种狭小的、落后的经济。由于我国地少人多，时有灾荒，个体农民力量薄弱，经营方法落后，广大贫下中农虽然与土地改革以前比较，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善，但他们中许多人在生产和生活上仍有困难。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产生两极分化；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同时，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对农产品的需要日益增大，要求农业提供更多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一方面工业化的发展对农业技术改造的支援也日益增强。这两方面也促进个体农业向合作化方向发展。

总之，随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结束，有计划经济建设的开始，社会主义工业化成为党在新时期的主要任务，为同社会主义工业化相适应，必须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正是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这种需要而提出来的，是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的。

四十六、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 基本经验及其意义

(一)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经验

1、从我国实际出发，不失时机地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土改后，党正确地分析了当时中国农民的两重积极性：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和互助合作的积极性，提出一方面不能挫伤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方面要提倡“趁热打铁”，不失时机地引导农民组织起来，发展互助合作的积极性。

2、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的一系列过渡形式。互助组，是在生产资料私有、个体经营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和对某些牲畜、农具的共同使用。具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是合作化最初的过渡形式。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各户把土地合并起来统一经营，入股的土地参加分红，实行一定的按劳分配制度，这是从个体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的决定性的过渡步骤。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统一经营、集体劳动，完全实行按劳分配。这样，使广大农民在逐步过渡中逐步提高社会主义觉悟，逐渐习惯于集体所有制的生产方式，避免因生产关系的变革使农民感到突然而造成生产的破坏和损失。

3、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必须坚持执行自愿原则，不能用简单号召和强迫命令的办法，更不能用剥夺的手段。必须采

取说服、示范和国家援助的方法使农民自愿联合起来，并不断显示出互助合作的优越性，以此去吸引农民自愿参加。坚持互利的原则，既不侵犯中农的利益，也不损害贫农的利益。

4、坚持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采取逐级领导试办，树立榜样，逐步巩固和推广的办法，坚持由低级到高级，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点到面的发展，并以增产、增收作为办好合作社的根本标志。

5、依靠农民的大多数和建立农村无产阶级的优势。土改后，我国农村出现了中农化的趋势。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中农分为上中农和下中农；对下中农，又分为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同时，把新中农中间上升为富裕中农的人们，不算作依靠对象，而把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一起算作依靠对象。这样，贫农和下中农一起，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党在农村依靠农民的大多数和建立农村无产阶级优势的问题。

对富农采取从限制到逐步消灭的政策，把消灭剥削阶级和改造剥削分子结合起来。

在上述方针政策的引导下，经过全党的努力，到一九五六年底，我国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虽然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由于脱离群众觉悟水平和干部管理水平的实际，产生了对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等缺点，出现了在变革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同时，追求生产经营规模越益扩大、集中的趋向，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但总的说来，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农业生产不仅没有下降，而且节节上升。

（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取得胜利的意義

在我国这样一个工业落后，农民众多的多民族国家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它把汪洋大海的个体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使五亿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就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党和毛泽东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提出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并且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四十七、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经验及其意义

（一）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经验

1、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采取赎买的方式进行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用“和平”的“赎买”的方法把资本主义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经济，这是马克思和列宁早就提出过但从来没有实现过的设想。党和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仍有两面性，既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共同纲领和宪法，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对民族资本不能实行强力

剥夺，必须实行和平改造的方针和赎买政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在政治上和民族资产阶级保持联盟的关系。这是从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中产生出来的政策。

2、创造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从低级到高级逐步过渡。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它把原来落后、混乱、畸形发展、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引上社会主义改造的轨道。公私合营企业，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形式，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形式。全行业公私合营企业，资本家除领取国家规定的定息之外，已经失去了对企业生产资料的支配权、经营管理权和人事调配权。企业基本上由国家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来经营管理，因此，它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

党通过这些形式，使资产阶级不太勉强地接受改造，逐步把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把资本主义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经济，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3、把对企业的改造和人的改造相结合，坚持了把原来的剥削者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方针。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党和政府对资本家的改造工作，是以企业为基地。在政治上，我们把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始终保持统一战线的关系，并吸收他们的代表人物参加各级政府工作；另外，还采取各种方式组织资本家参加比较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

的一个重要创举。

（二）意义

建国以后，在短短的几年内，在很少社会震动的情况下，成功地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胜利地完成了这一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几千年来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剥削制度被消灭，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四十八、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是怎样提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进行调查研究和集体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初步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一）提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毛泽东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是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就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毛泽东充分强调了农业的基础作用，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农业直接关系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而且是轻工业原

料的主要来源，是轻重工业的重要市场，出口的主要物资，积累的重要来源。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这样，才能使国民经济两大部类按比例协调发展，从而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地比较迅速地发展。

（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经济关系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经济关系作了分析，提出了正确处理这些关系的战略方针。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他指出，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基地，大力促进内地工业的发展，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为了加强国防建设，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有更大的进步。关于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毛泽东强调三者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要正确处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要坚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关心和安排好人民群众的生活，使个人收入逐步增加。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提出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方针，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要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关系。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正常进行，保持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报告对正确处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是非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中国和外国关系都作了重要论述。

《论十大关系》这篇著作，科学地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建

设中出现的各种矛盾，指明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正确方针，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阐明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规定了一系列经济建设的重大政策，它是经济规律的客观反映，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和原则。

四十九、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历史功绩及其意义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提前完成的情况下召开的。大会的历史任务，是总结七大以来尤其是建国后头七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制定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

（一）“八大”的历史功绩

1、大会正确地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提出了党在今后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八大”指出，一九五六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之后，国内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八大”根据我国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党今后的

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使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大会在指出党的工作重点不再是阶级斗争的同时，又指出在一些领域内阶级斗争将继续存在。

2“八大”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八大”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时指出：（1）应该根据需求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2）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3）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 and 年度计划的顺利执行，应付可能遇到的意外困难。（4）应该正确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财政支出也必须首先保证经济发展。

关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陈云在大会发言中指出：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又要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又要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

3. 大会提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八大”认为，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必须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官僚主义，以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会提出，为了巩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为了保

护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为了惩治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党对法制工作的领导，注意法制的教育。

4. “八大”强调指出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八大”根据党的地位的变化和形势任务的要求，及时地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大会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对主观主义；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反对官僚主义；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反对宗派主义。并告诫全党，我们一切任务能否胜利完成，归根到底是决定于党的领导是否正确，决定于党的领导能否实事求是，能否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

（二）“八大”的历史意义

“八大”是在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一次大会。它正确地分析了形势，适时地确定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制定了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以及经济建设上的一系列正确方针，“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是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的运用，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八大”所制定的方针路线，在为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程中做出了贡献，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始终一贯地得到贯彻执行。

附 录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五大运动】 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领导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五大运动。

（一）抗美援朝运动。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二十七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政，扩大朝鲜战争，同时侵略我国领土台湾。十月八日，鉴于美帝国主义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把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境，严重地危胁我国安全，党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毛泽东发出《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十九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到达朝鲜前线，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

一九五〇年十月至一九五一年六月，中朝人民军队，连续发动了五次反击战役，将美国侵略者赶回三八线附近，迫使美国同我方进行停战谈判。从一九五一年七月开始，中朝人民军队坚持以革命两手对付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两手，经过两年的谈谈打打，以打为主的激烈斗争，终于在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美国侵略者被迫在板门店停战协定上签字。

抗美援朝运动的伟大胜利，为保卫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的革命胜利果实，为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对国际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土地改革运动。一九五〇年六月三十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土地法》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同时，根据全国解放后的新情况，将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便更好地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稳定民族资产阶级，以利于早日恢复和发展生产。新区的土改从一九五〇年冬开始，分期分批进行。一般都经历了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没收和分配土地、复查总结等阶段。到一九五二年底，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全国约有三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七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

土地改革的完成，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

(三) 镇压反革命运动。全国解放后，国民党反动派残留着大批的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狂。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一九五一年二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作为具体量刑的标准。这次运动打击的重点是：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运动贯彻

了“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到一九五二年底，全国消灭了二百万以上的土匪，镇压、监禁、管制了大批反革命分子，基本上肃清了残留的反革命分子，安定了新中国的社会秩序，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四）“三反”、“五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领导工人阶级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一九五〇年上半年，人民政府对现有的工商业实行合理的调整，使私营企业有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但是，一部分不法资本家却以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方式向国家和人民猖狂进攻，一九五一年底，人民政府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国家机关少数工作人员严重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问题，因而开展了反对这三种错误的“三反”运动。同时发现这些问题同工商业者中的非法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一九五二年初，又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夏，“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

通过这场斗争，打击了资产阶级违法活动，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并在清除旧社会污毒方面，起了移风易俗的巨大作用。

（五）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从一九五一年十月起到一九五二年秋基本结束。首先从北京、天津的教育界开始，然后发展到整个教育界、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党中央根据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号召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经过思想改造，

在知识分子中清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影响，划清了敌我界限，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开始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宪法；制定几项重要法律；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新的国家领导人员。

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刘少奇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大会通过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这部宪法中，把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为全国人民的总任务确定下来。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长，宋庆龄等十三人为副委员长，董必武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大会选出常务委员会为常设机关。

这次大会，结束了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和以《共同纲领》代替宪法的过渡状态。这次大会通过的宪法及其他法律，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初步基础。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 党中央为了揭露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于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刘少奇

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向全会作了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四十四位同志在会上发了言。揭露了高岗、饶漱石大量反党事实，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指出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高级干部对于维护党的团结，负有重大责任。批准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和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通过了一九五四年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会后，干部和党员学习和贯彻执行这次会议的决议，大大加强了党的团结，从而保证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一九五六年一月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大力发展和运用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必须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为此，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至二十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报告》就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如何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继续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以及加强党的领导等方面，作了全面阐述。指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毛泽东在讲话中，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会后全国出现了“向科学进军”的新气象。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五十、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主要 内容和重大意义

一九五六年，我国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剥削制度已经基本消灭，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阶级斗争虽然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

（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主要内容

1. 全面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它们之间有基本适应的一面，又有不适应的一面。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党和国家可以自觉地认识和运用矛盾的客观规律，按照具体情况，依靠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调节作用，通过执行正确的政策，不断地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

2. 科学地阐明了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理论。毛泽东在全面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处理这类矛盾是采用专政的方法。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包括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以及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在我国，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本来是对抗性的，但是由于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被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人民政府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有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一般说来，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是采用专政的方法，而是采用民主的方法。

3. 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正确方针。毛泽东提出，在人民内部要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也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具体说来，在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上应当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应当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经济工作中，要统筹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根据情况，适当安排。

4. 提出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矛盾问题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5. 毛泽东还提出了从中国实际出发，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毛泽东强调在工业化问题上，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的经验，必须从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二）这篇著作的重大意义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重要著作，深刻地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并提出了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针。这对于党和国家把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

五十一、怎样正确认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

（一）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进行坚决地反击，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

一九五七年确有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确有极少数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和社会社会主义制度猖狂进攻。为了适应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形势，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四月二十七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中，广大群众、民主人士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对党在工作和干部作风提出了大量的有益的批评和建议，整风运动收到了初步成效。但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向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攻击共产党的领导是“党天下”，公开提出要“轮流坐庄”；他们诬蔑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狂热鼓吹西方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自由”；他们要为反革命分子翻案，提出成立所谓“平反委员会”；他们极力鼓动、挑拨青年学生、工人、农民起来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这些右派分子的言行表明，他们的企图就是要取消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对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完全正确的。否则，如果不进行反击，不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全国就要陷于政治上思想上的大混乱，我们就不可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二）在反右派斗争中犯了严重地扩大化的错误

由于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干严重，加上不适当地支持了大鸣大放，形成了一次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以致造成了严重地扩大化的错误。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

部错划为右派分子，误伤了许多同志和朋友。在反击过程中，打击面宽了，对大批的人处理得不适当，许多人因而受了长时期的委屈和压制，使他们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反右斗争扩大化的教训告诉我们：（1）在社会主义时期内，对于某一个时期出现的重大思想动向和社会思潮，一定要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查明来龙去脉，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2）问题发生在什么范围、什么领域，就在什么范围、领域解决，不要任意扩大，更不能随意发动全局性的政治运动；（3）一定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时看不清的，要先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4）作为一个整体的“四大”，并不能发扬民主，只能妨碍人民行使正常的民主权利，破坏安定团结，影响社会主义建设。

总之，要全面地历史地认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

五十二、“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出现的原因和教训

（一）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国民经济的比例严重失调，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非常困难。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是：

1. 主要是党在指导思想上犯了“左”倾错误和党的工作指导方针上发生了严重失误。

（1）由于党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对经

济发展规律和我国的国情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接连而来的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之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

(2) 北戴河会议后不久，毛泽东和党中央就开始发觉了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错误，曾努力领导全党来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农村工作和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但由于当时没有从根本的指导思想上总结经验教训，在纠正“左”的错误时，又片面地强调“气可鼓不可泄”，这就不能不影响到纠“左”工作的进程。

(3) 庐山会议后期又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并由此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批判所谓右倾情绪和右倾思想。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助长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和党内崇拜现象的发展。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左”倾错误延续了更长的时间。

2. 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是造成“三年困难”不可忽视的原因。

(1)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我国连续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大量农田受灾，粮食减产，农业连年歉收，这使部分轻工业也受到了严重影响。

(2) 苏联政府在政治上、经济上以至军事上控制中国的

企图遭到失败后，一九六〇年七月，我国经济严重困难时，又趁火打劫向我们逼债，背信弃义地突然决定在一个月內撤退全部专家，撕毁了几百个技术协定和科技合同，停止供应我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并挑起中苏边界纠纷。苏联政府的背信弃义，严重地扰乱了我们发展国民经济的原定计划，使我国二百五十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状态，给我国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

(二)“三年经济困难”的教训

1.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必须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努力做到各经济部门按比例地协调发展。决不能单凭主观愿望，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高积累，片面强调重工业尤其是一两种产品的发展速度。

2.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有利生产的发展，决不能离开我国生产力的现状，轻率地改变生产关系。

3. 在党、国家和群众生活中，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决不能压制民主，决不能搞个人专断，这样才能及时发现和纠正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错误。

五十三、“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方针的提出、实施及意义

(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提出

1. 由于连续三年“大跃进”和“反右倾”的“左”倾错误，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到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已完全失调，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处于严重的不平衡状态中。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发生严重困难，再不采取正确措施，工农业生产则难以继续下去。

2. 一九六一年一月，党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个方针是以调整（主要是调整农轻重、工业内部、生产与基建、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为中心，巩固已经取得的经济成果，充实轻工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提高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为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做好准备。

3. “八字”方针的提出及一系列正确政策和果断措施的制定，是党中央集体智慧的产物，它的贯彻执行是毛泽东和党中央重新认识和纠正经济工作中左倾错误的开始。这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

（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实施及其重大成就

1. 贯彻“八字方针”的曲折发展过程。贯彻“八字”方针的曲折过程大体可分为三步：

第一步，从“八字”方针提出到一九六一年底，党集中精力解决农业问题。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集中力量对农村生产关系和有关政策进行调整，制定各方面的工作条例，纠正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农村实际工作中的主要错误，对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对工业等方面的调整进展迟缓，全国经济形势仍很困难。

第二步，从党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到一九六二年底，党全面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会对统一全党的认识，加强团结，动员全党坚决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二月的西楼会议、五月中央工作会议对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扭转形势，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根据会议决定，党集中力量对工业、基建和财经方面进行调整，主要措施是：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压缩基建规模，缩短重工业战线，充实轻纺工业；加强农业战线，发展农业生产；稳定市场，回笼货币，消灭财政赤字。由于这一年调整工作成绩卓著，经济状况有明显好转。

第三步，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党继续贯彻“八字”方针，是在又调整又发展中前进的。经过继续调整，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形势明显好转，一九六四年调整任务基本完成，一九六五年又调整一年，国民经济获得了恢复和发展，扭转了基本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困难局面。

2. 贯彻“八字”方针取得的重大成就。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到一九六五年底国民经济全面好转，已经达到和超过了一九五七年水平，并继续向前发展，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

(1) 工农业生产接近和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平衡发展。一九六五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九；

(2) 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基本恢复正常，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3) 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还清了苏联的全部债款，对外贸易有所发展；

(4) 文教、卫生、体育、科技、国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一九六四年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三) 贯彻“八字”方针的意义

由于“八字”方针的贯彻实施，在许多重要方面克服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左”倾错误所造成的恶果，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成功地克服了当时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局面，把国民经济纳入正常发展的轨道，建立了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培养了大批经济文化建设的骨干力量。不仅如此，它还为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对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的新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十四、一九六二年初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一九六一年，党在纠正“左”的错误，贯彻“八字”方针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进展，但从整个经济形势来看，由于“八字”方针没有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全面彻底的贯彻，因而仍未能摆脱困境。党中央认为，必须从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加强民主集中制入手，以便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切实做好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为此，中共中央于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在北京举行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

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七千多人，故又称“七千人大会”。

（一）七千人大会的主要内容

这次大会的主要内容集中反映在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所作的“书面报告”和毛泽东的讲话中。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1. 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党在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1）“书面报告”在肯定一九五八年以来取得的成就的前提下，指出“大跃进”以来的主要缺点错误是：第一，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的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发生严重不协调的现象。第二，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曾经对集体所有制的内部关系进行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平均主义的错误。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犯了急于把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错误。第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的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第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应的状况，加重了城市供应的困难，也加重了农业生产的困难。

（2）“书面报告”认为产生这些缺点错误的原因是：一方面，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

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指标过高、要求过急等缺点、错误,又助长了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民主的错误作风。这就妨碍了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

(3)会议初步总结了建国以后,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指出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是我们一个根本方针;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不能混淆;社会主义经济要有统一的计划,计划指标必须符合实际,留有余地,计划工作必须注意综合平衡;必须充分发展商品交换;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我们的交换原则是等价交换;要认真贯彻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制;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党必须把自己的领导同群众的实践结合起来。

2. 发扬了党内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

(1)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着重阐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指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就不可能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就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无产阶级政权就不能巩固。并指出,发扬民主的界限,一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

(2)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了发扬党内民主,克服少数

人或个人独断专横现象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来自党委本身的监督。提议，把领导人的主要的小组生活，放到党委会，在党委会里真正造成一个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

3. 动员全党全面贯彻“八字”方针，切实抓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

(1)会议针对当时党内外一些同志对克服严重经济困难信心不足等消极思想，进行了分析和教育。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党有五个优点，即：有好的领导思想；有好的党中央；有大批好的骨干，包括大批新的积极分子；有一个好传统，就是有理想，有志气，不怕“鬼”；有好的人民，人民对我们党有最大的信赖。这样，我们党就能领导好国内各方面的工作。

(2)会议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一九六二年经济建设方面的任务是，从各方面加强农业战线，积极地增加轻工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坚决实行精兵简政的方针，继续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调整工业企业的生产任务，认真做好商业工作，保证完成国家计划规定的重工业产品的生产指标，所有企业都必须切实地改进管理工作，彻底清查物质，认真贯彻试行中央制定的各方面的工作条例。

这次大会，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也有不足之处，对“大跃进”以来，党的指导思想的主体错误，没有从根本上加以认识和总结；对当前国内经济困难的严重程度在认识上尚不一致；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也没有能够进行认真清理。这样，对党内“左”的错误思想和实际工作中的错误不可能给以彻底纠正。

(二) 七千人大会的意义

七千人大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召开的一次规模最大，具有重要意义。它对于清理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好转，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在党的建设，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不良作风等方面都有很好的影响。《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五十五、为什么说开始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时期成就是主 要的？有哪些经验教训？

(一)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工作成就是主要的

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也遭到一些严重挫折，但成就与挫折相比，成就是主要的，是这十年中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1. 在这一时期党的工作成就

(1) 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在这十年中，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三倍；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设起来，从一九六五年起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冶金、机械、煤炭等原有工业部门中一大批新办工厂投入生

产。农业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也有很大成绩。这些都为八十年代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2)培养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建设人材，现在我国经济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十年中，培养了一百三十九万高等学校毕业生和二百二十一万中专毕业生。科技队伍迅速壮大，科研水平不断提高，科技成果比较突出，有些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条件。

(3)我们党在这十年中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理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加强企业管理，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等。这些重要经验，对于当时纠正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克服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严重困难，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对于当前国民经济调整，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都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

2. 这一时期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但和这一时期的成就相比，是局部性的、非主流方面。在这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的失误，例如在一九五七反右斗争中，发生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一九五八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破坏了国民经济

平衡的发展；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批判彭德怀的斗争，中断了纠“左”工作，使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在一九六五年初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开展了过火的斗争。这些严重的失误，曾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但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党的工作还是在曲折的道路上继续发展的。

(1)从党的指导方针看，党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这十年中，党在“八大”路线指引下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取得极可宝贵的正反两个方面经验；党的领导虽然犯有错误，但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基本正常，全党、全国人民仍然用主要精力抓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讲话时还说：“要把做好当前的经济调整工作放在第一位，不要因阶级斗争干扰了这项工作”；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纠正错误，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进行了巨大的努力，并取得很大成就。这说明从总体上看，十年中党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

(2)从党的实际工作看，十年中大部分时间也是正确的。第一阶段，一九五七年是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胜利的一年。这一年的经济工作，是建国以来经济效果最好的一年。反右派斗争的消极影响，主要是在知识界和民主党派中，对经济

建设影响不大。第二阶段，三年“大跃进”。总的说错误是主要的，但也应具体分析。五八年上半年，“左”的指导方针还处在酝酿、形成过程中，生产秩序还没有失常，并取得一定的成果；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发动“大跃进”后，“左”倾错误才严重泛滥起来，但时间不到半年；五八年十一月郑州会议到第二年七月庐山会议前的半年多时间内，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了一些“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到六〇年下半年，由纠“左”变为反右，指导思想更“左”了，因而错误发展得更加严重，但时间只是一年多。所以，在三年“大跃进”里，“左”倾错误最严重的时期只有一年半左右。第三阶段，是调整、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从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到一九六五年底的这个时间里，“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虽然没有彻底纠正，但由于形势所迫受到客观法则和实践的惩罚，以及人民群众不同程度的抵制，党和毛泽东对国民经济实行了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在实际上停止了“大跃进”，使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

上述情况说明，在这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党的工作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因而才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二）在这十年中应吸取的历史经验教训

1.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而不能因为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

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而离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重点；更不能靠抓“阶级斗争”来推动生产建设。

2.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必须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努力做到各经济部门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决不能单凭主观愿望，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高积累，片面强调重工业尤其是一两种产品的发展速度。

3.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发展生产，决不能离开我国生产力的现状，轻率地改变生产关系。

4. 必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决不能夸大敌情，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

5. 在党、国家和群众组织生活中，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决不能搞个人专断，必须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决不能被胜利冲昏头脑，搞主观主义瞎指挥。

附 录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一九五六年，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各种矛盾的基础上，为促进社会主义科学、文化、艺术的发展和繁荣，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下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共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这一方针的着重点，是发扬社会主义的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主张在坚持六项政治标准的前提下，在人民内部采取放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流派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讨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自由讨论和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式去解决。它是指导我国文艺科技事业的发展，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重要方针。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一九五八年五月，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当时规定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

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经济建设中实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等等。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条总路线及其基本点，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

【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召开的。会议讨论了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当前的工农业生产、农村工作、教育工作、民兵工作等问题。会上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决定号召全党全民为在一九五八年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即比上年增加一倍而奋斗。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会议认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组织形式；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会后，在全国很快形成了全民炼钢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使国民经济遭到重大损失。

【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举行。会前，毛泽东在郑州、武昌分别召开部分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会议，为这次全会作准备。

全会主要是为进一步纠正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召开的。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初步总结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在肯定人民公社的同时，指出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

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并决定结合生产对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整顿和巩固工作。全会提出的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初步降低了八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工业生产的高指标。会议讨论并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和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在江西庐山先后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前期，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十九个问题进行座谈讨论，以继续纠正当时已经觉察到的“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七月十四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陈述他对一九五八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教训的意见。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指责此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此后，会议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八月十六日，中央全会错误地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全会还检查了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通过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搞好综合平衡，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精神，调整降低了国民经济计划指标。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间，在我国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共中央先后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

案)》(即《前十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作为指导运动的文件。“社教”运动,农村起初以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为主;城市为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后来,城乡“社教”运动的内容都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和清组织四个方面,统称“四清”运动。这个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二十三条》中又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提法后来发展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论点之一。

“文化大革命”时期

五十六、“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及错误性质

(一)“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

1. 毛泽东领导上的错误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毛泽东领导上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二是不谨慎，骄傲，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

2.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并持续十年之久，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

(1) 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产生和被全党所接受的社会历史原因：

第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

第二、我党长期处于战争和剧烈阶级斗争环境，对搞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

第三、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仍用过去搞阶级斗争那一套方法来处理建设中的新问题。这样，易于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是阶级斗争；或是对新条件下产生的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习惯于沿用过去熟悉的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来处理，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第四、对马列原著中一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如“限制资产阶级权利”，“小生产每日每时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等等，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

第五、苏联领导人把中苏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各种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在国际上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影响下，又错误地把这一斗争引入国内，在国内进行反修防修运动。接着又引入党内，把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和一般的错误倾向，当成党内修正主义路线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

由于上述原因，毛泽东提出了一些“左”倾观点，而这些“左”倾观点提出后党就很难抵制，这些“左”倾观点的发展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很久。

(2) 个人专断作风严重的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和不能为全党所防止的社会历史原因：

第一、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某些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影响。

第二、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有一定影响。

第三、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

由于上述原因，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延续。

(二)“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性质

1. “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1)“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文化革命，而是对社会主义文化的破坏。十月革命后列宁讲的文化革命是指发展教育和科学文化事业，扫除文盲，提高人民的知识水平等等。我们所进行的这场“文化大革命”，除首先是从文化界开始这一点同“文化”有一点联系外，再没有一点“文化”革命的内容，有的是对文化的大破坏，根本不是文化大革命。

(2)“文化大革命”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政治革命，而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削弱。马克思主义通常讲的政治革命，主要是指夺取政权，但并非任何夺取政权都是政治革命，而是要看它有没有政治与经济基础。我国在搞“文化大革命”前，以公有制为主的生产关系基本上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等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所以，在没有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的情况下搞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

的政治大革命，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革命。

(3) “文化大革命”不是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人们的世界观要自觉地进行改造，而是对世界观改造的强制。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人们的世界观是需要改造的，没有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工人运动也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必须从外面灌输。改造世界观的基本途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参加社会实践。但“文化大革命”，却把许多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批判了，把是非、敌我混淆了，党内外盛行的是无限上纲、逼供信、打砸抢抄抓等等，这同马克思主义主张思想改造有天壤之别。

可见，“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2.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1) 这场“文化大革命”发生在国内，大量的斗争发生在人民内部，特别是在共产党内。在这场斗争中，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搞乱了革命队伍。这场“大革命”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是乱了自己。

(2) 这场“文化大革命”，是领导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对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错误估量，搞错了矛盾的性质，采取了错误的方法，作出了错误的决策而造成的。

(3) 党的领导者的错误，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并把它推向极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上述情况说明，“文化大革命”搞乱了我们自己的思想、政治、经济、组织，搞乱了我们党政军民学等各方面，总之

是搞乱了自己。所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重的内乱是很确切的。

五十七、为什么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论点，在“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党的九大还把这个理论作为党的纲领的主要内容加以肯定。这个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且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后，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而且不止进行一次，还要进行多次。这个理论的一系列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其错误主要是两大方面：

（一）这个错误理论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

1. 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革命，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前的任务。而在夺取政权以后，就要运用掌握的政权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在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政权的地区，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因而在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并且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

造基本完成之后，虽然还有繁重的革命任务，在一定范围内还有阶级斗争，但已经不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毛泽东违背了他在七届二中全会讲话精神，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已经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情况下，搞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势必形成自己人打自己人的内乱，这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的。

2. 我国当时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从经济上看，当时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没有根本改变生产关系的客观要求。从政治上看，我国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早已完成，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无产阶级的政权根本没有被资产阶级篡夺，当然也不存在从资产阶级手中重新夺取政权的问题。因此，主观地、人为地进行什么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已证明是完全错误的。这样只能是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只能破坏和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破坏和削弱党的领导。

(二)这个理论是对国内阶级形势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错误估计的结果

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基于对国内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这种错误估计主要表现在：

1. 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

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

2. 认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

3. 认为不仅从前的剥削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且认为党员、工人和农民的一部分都有演变为资产阶级的可能，认为新老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几乎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当中大部分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等。

实践证明：这种错误估计是把局部问题夸大为全局性的问题，把现象的东西夸大为本质的东西，这是脱离我国阶级形势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主观主义。因此，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左”倾的错误理论，必须完全否定。

五十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 “文化大革命”中的罪行

（一）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策划推翻人民民主专政

一九六七年一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指使和策动下，伙同王洪文等夺了上海市委的领导权。林彪叫嚷“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权。”张春桥多次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

为了达到反革命罪恶目的，他们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

和国家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彭德怀、贺龙等。其中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被迫害、折磨致死。他们还制造假案，编造了迫害中共八届中央委员成员的名单，把二百多名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打成“特务”、“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分子”等。

他们为了搞乱全国，颠覆人民民主专政，还煽动乱军和砸乱公、检、法。提出“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彻底砸乱公、检、法”等反动口号，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在他们的煽动下，全国各地发生了冲击公、检、法机关，抢档案，残害公、检、法人员，甚至出现了冲监狱、放犯人的严重事件。

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迫害下，党和国家大部分领导人被打倒，党的各级组织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转，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遭到极大破坏。而他们在乱中控制了中央组织部门、宣传部门和国务院一些部门的领导权，取得了一些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权和一些军事机关的部分领导权。

(二)迫害、镇压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制造大量冤假错案，煽动“打砸抢”，挑动大规模武斗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实行反革命统治，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迫害、镇压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冤狱遍于全国。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策略核心是“乱”，妄图乱中以帮代党，乱中夺权。在全国煽动“打砸抢”，“文攻武卫”，挑动群众组织之间的大规模武斗，制造全国性内乱，给我国各族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

(三)破坏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在政治上，疯狂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歪曲和否定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历史。他们把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的全部成就污蔑为“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极力鼓吹“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实行所谓“全面专政”。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在他们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实行法西斯专政。

在经济上，反对发展社会生产力，主张用阶级斗争代替生产斗争。大批所谓“唯生产力论”，攻击四个现代化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攻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是“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煽动工人停工停产。攻击按劳分配是“物质刺激”、“奖金挂帅”，主张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这一切导致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大破坏。

在文化上，取消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限制人民言论、出版自由。反对吸取历史文化遗产，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他们以改革教育为名，废除大学招生考试制度，破坏学校教育的正常秩序。他们推行文化专制主义，虚无主义和愚民政策，使我国文化、教育、科技事业遭到空前的破坏。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对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严重损害，使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四)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和策动上海反革命武装叛乱

1. 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抢班夺权，企图杀害毛泽东主

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一九七〇年三月，中央开始修改宪法和召开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林彪集团认为，这是他们首先争得国家主席职务的好机会。于是，多次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同年八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发动了突然袭击，会上大讲“天才”问题。陈伯达抢先发出吹捧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的“简报”，煽风点火，制造混乱。党中央很快察觉了林彪一伙的阴谋，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揭穿了“称天才”的骗局，严厉批评了陈伯达，给林彪反革命集团以沉重的打击。

林彪一伙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夺取最高权力失败后，加紧策划和准备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一九七一年三月，林彪指使林立果等在上海制定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阴谋杀害毛泽东，夺取全国政权。同年八月毛泽东到南方巡视，林彪一伙妄图在旅途中阴谋杀害毛泽东。但是，由于毛泽东及时察觉了他们的阴谋，突然改变行程，九月十二日安全到达北京。林彪一伙阴谋计划破产后，准备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但又被周恩来等发觉。十三日凌晨，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登机强行起飞，仓皇出逃，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林彪集团的余党或自杀毙命，或束手受擒，一场反革命武装政变被彻底粉碎。

2. 江青反革命集团策动上海反革命武装叛乱。

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反革命集团以上海为基地，大抓武装力量，策划组织“第二武装”，阴谋武装暴乱。他们以搞所谓民兵、保卫、消防“三位一体”的试点为借口，大抓枪杆子。一九七六年七月、八月间毛泽东病重，他们便在上海

给帮派武装突击发了大批枪枝弹药。毛泽东逝世后，他们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十月六日，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粉碎了他们的阴谋。但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民兵组织，设立秘密指挥点，准备武装叛乱。由于党中央作出了周密的计划，采取了有力措施和上海人民的积极斗争，使他们的反革命武装叛乱计划终成泡影。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被粉碎，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五十九、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和人民同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哪
些斗争？

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和人民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多方面的，这种斗争贯彻于十年内乱的始终。主要有：

（一）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抵制和斗争

1、一九六七年二月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大多数成员对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中央碰头会和稍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挺身而出、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

要党的领导？老干部应不应该全部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并提出了严正的批评，特别是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煽动“怀疑一切”，搞乱全国的罪恶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当面揭露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指出：“你们的目的是要整掉老干部”，让一些坏人上台搞修正主义。老同志坚决表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就是“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二月抗争，是党中央最高领导层抵制“左”倾错误领导，反对林彪、江青一伙阴谋作乱的正义斗争，是一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坚持党的正确领导的原则斗争。这次斗争虽然遭到压制和打击，但是他们敢于坚持真理和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为全党树立了榜样，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它鼓舞广大党员和群众为捍卫党的事业进行坚决的斗争。

2、一九六七年夏，以“武汉七·二〇事件”为代表的广大群众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篡党夺权、反党乱军的斗争。同年七月，王力、谢富治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到武汉。他们秉承林彪、江青一伙的旨意，对抗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发表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煽动反军乱军、破坏军民关系、支持武斗的讲话，造成武斗急剧升级，机关瘫痪，工厂停产，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广大群众对王力等人的罪恶行径十分愤慨。七月二十日，群众纷纷上街游行，部分群众、解放军指战员和王力进行了说理斗争，表现了广大群众、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的坚

决反对。

3、以张志新为代表的广大党员、群众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肆虐横行的日子里，不仅广大群众进行了不同规模的斗争，而且成千上万的党员、团员、干部、解放军战士，自觉地个别地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张志新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她是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她便识破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反革命阴谋，挺身而出，在群众面前公开进行揭露。她认为：林彪的“顶峰”论是错误的，不同意林彪做接班人；她公开申明对江青有怀疑，认为江青不是什么“文艺旗手”，而是破坏祖国文化艺术的祸首。一九六九年被捕入狱，她在刑场和法庭上，坚贞不屈，坚持斗争，直至牺牲。

（二）毛泽东、周恩来领导全党粉碎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武装政变和周恩来提出批判极左思潮

1、毛泽东、周恩来领导全党粉碎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武装政变。林彪反革命集团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阴谋用“和平过渡的办法”篡党夺权。被毛泽东揭露后，又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下令，密谋在毛泽东南巡途中杀害他，因被毛泽东识破，提前回到北京而未得逞。随即准备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实行割据，分裂国家，因被周恩来及时发现，断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使林彪南逃阴谋破产；阴谋败露后，林彪及几个死党，于九月十三日私乘飞机外逃叛国，途中机毁人亡，一场反革命武装政变被彻底粉碎。

毛泽东、周恩来果断、机智地粉碎了这次事变，保持了全国政治局势的稳定。

2. 周恩来提出批极左思潮。在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时党在各方面工作都有了转机。特别是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鉴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流毒对实际工作的影响，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意见。这实际上是一九六七年二年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在这一期间召开的全国计划、公安、科学、出版等会议上，都把批“左”放在主要位置，取得了好的效果。一九七二年八、九月间，周恩来又两次强调批“左”。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讲话的精神，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批极左思潮的文章，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在全国引起强烈反映。

（三）党和人民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1. 毛泽东批评和揭露江青集团及其组阁阴谋。“批林批孔”运动开展后，当毛泽东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时，多次对他们作了严厉地批评，告诫他们“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并一再声明：“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这是第一次公开指出“四人帮”的问题。

一九七四年十月，党中央发出通知，决定近期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人帮”认为时机已到，加紧进行阴谋活动，妄图组织他们的“内阁”并向毛泽东“告状”，诬陷周恩来，吹捧江青，企图阻挠周恩来主持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实现由他们组阁的阴谋。毛泽东一再批评江青，“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

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自己作党的主席”。毛泽东的批评与建议，以及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抵制，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

2.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针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搞乱了各条战线，进行有成效的整顿。四届人大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先后召开了农业、交通、科技和军事等各方面一系列重要会议，坚决果断地采取各种有力措施，着手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混乱，开始对各条战线进行全面整顿。

一九七五年二月，党中央在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意见的基础上发出了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文件，要求全党贯彻毛泽东提出的“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要求，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加强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接着，对铁路运输、工业、农业、财贸、教育和军队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六月二十日至七月十五日，党中央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叶剑英，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清算和批判了林彪对军队工作的干扰和破坏，提出了整顿军队的任务。

各条战线的整顿，实际上是将“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而这些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方针政策恢复过来。通过各条战线的整顿，全国政治、经济形势明显好转。

3. 全国掀起反对“四人帮”的抗议运动，江青反革命集团被彻底粉碎，十月的历史性胜利。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

来总理逝世，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无限悲痛。群众自动地采取各种方式，开展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但是，遭到“四人帮”的压制和迫害，他们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愤怒。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纷纷自发举行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活动。北京市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到天安门广场敬献花圈和诗词。在四月五日清明节这天，天安门广场上的广大群众，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采取抗议行动。尽管“四人帮”进行残酷镇压，但是广大党员和群众并没有屈服，使他们更认清了“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坚持斗争，加速了“四人帮”的灭亡。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伟大的人民革命运动，显示了经过党长期教育的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认为时机已到，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四人帮”作恶多端，害党害民，最后发展到妄图发动反革命政变，这已超出党内斗争的范围。十月六日，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拘禁审查，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十月历史性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开辟了我国历史发展的新时期。

六十、“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文化大革命”给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主要是：

（一）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情况下，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过去我党所犯的错误，就是没有坚定不移地实现这个战略转变，没有坚持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相反，“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批所谓“唯生产力论”。这样不仅颠倒了理论是非，而且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困难和巨大的损失。今后，除大规模地外敌入侵外，决不能轻率的离开这个重点。

（二）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的国内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必须作出合乎客观实际的科学分析，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方法。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之后，我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大多数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的社会主义社会，提出和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是错误的。“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我国社会的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并且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对阶级斗争应严格限制在它发生的范围之内，并依靠法律手段进行处理。我们既反

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又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更不能人为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思想斗争，要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方法正确的解决。

（三）必须正确理解和处理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之间的相互关系。马克思主义承认领袖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决不能任意夸大领袖的个人作用。领袖人物和他们的威信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产生的，要维护领袖人物的威信。起进步作用的领袖必须是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和群众意志的執行者，他们的活动和领导必须遵循党的组织原则，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任何领袖都不是神，都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都不应当加以神化，不能再搞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一定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反对个人专断，加强党的集体领导。

（四）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切实保障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力，使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社会主义法制的根本任务是保障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体现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统一意志和根本利益。法律是庄严的，不可破坏的，我们过去没有重视这个问题，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钻了空子，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场荒唐的丑剧，这个教训告诉我们，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不断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准绳，使社会主义法律成为维护人民权利，制裁犯罪行为，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强大武器。

(五) 切实加强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学习和教育。我们党和国家的任何一项正确政策，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下，以对客观形势的科学分析为依据的。政治上的错误，归根结底来源于理论上、思想上的错误。历史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中许多被批判的东西，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如抓生产建设被批判为“唯生产力论”；承认物质利益的重要作用，被说成是“鼓吹资本主义”，是“修正主义”，等等。反之，“文化大革命”中许多被宣扬的东西是错误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如无政府主义的“大民主”，被称为无产阶级的真正民主；“踢开党委闹革命”，打、砸、抢、抄、抓，被称为“革命行动”、“造反有理”等等。这些固然是与林彪、“四人帮”别有用心的歪曲、篡改或断章取义加以利用有关，但是，也反映了广大干部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因此，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和教育十分必要，这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六十一、如何理解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同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破坏，搞反革命活动，性质根本不同，绝不能混淆在一起。《决议》所以说毛泽东所犯的错误还是一个伟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其主要原因是：

(一)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为了反修防

修。他经常注意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还是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革命的纯洁性，把我们的党和国家搞好。但是，由于他晚年在阶级斗争理论问题上的“左”倾错误，使他没有能够对党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给予正确的分析，致使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二）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在主观上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三）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如对待干部问题上，他虽然错误地指出“走资派”是斗争对象，但他并不是要把党政军干部都打倒。相反，他多次强调，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他还严厉斥责了林彪、江青一伙对被拘留审查的老干部严刑拷打的法西斯行为，他一发现冤假错案就加以纠正。他还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这些事实说明了毛泽东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

（四）他领导我们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对江青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错误之一，是重用了林彪、江青一伙人。但是，当他发现他们的问题和阴谋之后，又和他们作了坚决斗争。对于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毛泽东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对于江青一伙，他揭露了他们的“组阁”阴谋，指出他们是“四人帮”，始终没

有把最高领导权交给他们。这些都对后来我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的作用。

（五）他晚年仍然警觉的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外交政策，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在外交方面继续建立了功绩。

（六）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都和毛泽东的巨大作用分不开。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他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错误，这与他他对革命的长期的伟大贡献来比，是第二位的。对于功绩，我们既要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伟大贡献，这是主要的，又要看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起了许多有益的关键性作用，两者不能割裂。

附 录

【《五·一六通知》】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同志的所谓“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五月十六日，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分为三部分：一是前言，宣布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写成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和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之下；二是列举《二月提纲》的所谓十条罪状，逐条“批驳”；三是结语，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号召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通知》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通知》为“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成为整个运动的纲领。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是在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还没有建立起来的不正常情况下召开的。出席大会的代表一千五百一十二人，代表约二千二百万党员。代表不是通过党员民主选举，而是通过所谓“协商”实际上是由极少数人指定而产生的。大会主要议程是：林彪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主持了大会开幕式，强调把大会开成团结、胜利的大会。林彪向大会作政治报告，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和实施过程，极力宣扬“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丰功伟绩”，全盘肯定了“左”的方针和方法。报告把毛泽东一九六二年提出的关于阶级斗争的一段论述，规定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九大通过的新党章，全面背离了八大党章的正确内容。对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了歪曲的阐述，砍掉了党员的权利，特别是公然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总纲。这种错误作法，同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是根本不相容的。

九大选举中央委员一百七十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〇九人，其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五十三人，不到总数的五分之一。林彪、江青一伙主要成员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他们的不少亲信和骨干进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掌握了更多的权力。

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合法化，加强

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这次会议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一千二百四十九名，代表全国二千八百万党员。周恩来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选举出一百九十五名中央委员和一百二十四名候补中央委员。

大会批判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揭露了他们反革命两面派的本质。同时，大会还把邓小平、王稼祥等一批久经考验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排斥和打击的老同志选进了中央委员会。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十大仍然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仍然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错误地认为“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十大通过的党章是九大党章的继续，个别地方还增加了新的错误内容，如说“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等等。

十大及十届一中全会在组织方面也延续了九大的错误，使一大批“四人帮”骨干分子，混进了党的中央委员会，特别是王洪文当了党中央副主席，张春桥当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大大加强了江青集团在核心领导机构中的地位，使他们在中央政治局组成“四人帮”，从而为他们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历史的伟大转折时期

六十二、为什么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 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党进行了许多艰巨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随着揭批查运动的深入，党内外同志逐渐察觉到“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左”倾错误，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可是，遇到了严重的阻碍。党的领导在纠正过去错误方面，在打开新的工作局面方面，往往落后于群众的要求，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没有得到清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受到压抑，一些工作不能正常地顺利地开展，甚至还出现一些新的失误，使党的工作呈现出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

1. 在客观上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时期内清除。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在政治思想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粉碎“四人帮”后，这种混乱也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当时我们党对全面清理“左”倾错误的思想准备还不够，这就必然影响到党的各项工作的正常进行。

2. 主观原因主要是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指导

思想上继续犯“左”的错误。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是有历史功绩的，以后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他在粉碎“四人帮”后头两年时间里，全盘继承了毛泽东晚年一套错误的东西，他从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左”的理论和方针，阻碍全党纠正过去的“左”倾错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实质是要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延续下来。他坚持“左”倾错误的思想理论、政治口号和政策，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肯定党内还有“走资派”，“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他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对经济工作的急于求成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也负有责任。华国锋的这些错误，使党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工作上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六十三、为什么说“两个凡是”的方针是错误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有何重大意义？

（一）为什么说“两个凡是”的方针是错误的

“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是在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两报

一刊”的社论中公开发表的。为什么说“两个凡是”的方针是错误的？

1. “两个凡是”的方针，是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方针。革命导师的言论、著作都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及其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有的随情况变化而过时，有的纯属这样或那样的失误。因此，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正确地、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是，“两个凡是”却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认为凡是革命领袖说过的话，不管实际情况如何，不管对与错，都必须句句照办，一句都不能改。这种态度，只能使人思想僵化，而不能从长期的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不能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

2. “两个凡是”的方针，违背党和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革命理论是革命行动的指南，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依据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而“两个凡是”的方针，则违背上述基本原则，无视我国的具体情况，无视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主张继续贯彻“文化大革命”中“左”的一套东西，不许有任何变动，这是完全错误的。

3. “两个凡是”的方针，违背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一根本立场。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人或一个政党犯错误是难

免的，问题是能够认识错误，迅速地加以改正错误。但是，“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却以“高举”为借口，把毛泽东说过的或定了的事情，不管对错，只能照办，不能更改，这就掩盖了过去所犯的错误，使我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无法纠正，一大批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打倒的老干部不能恢复工作，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许多冤假错案不能平反，是非界线，敌我界线得不到澄清，完全违背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正确立场。

（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

一九七八年五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决不只是一般哲学问题的争论，而是在思想上，理论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这次讨论，对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解放，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意义。

1. 极大地促进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使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这次讨论，广泛地宣传了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使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深入人心，冲破了多年来盛行的个人崇拜和各种禁区，实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人们开始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正确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注意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注意在新情况，新问题面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的加以解决，促进了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2. 促进了党的拨乱反正工作的胜利开展，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它引导人们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推动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发展和各项

工作的整顿，促进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重大问题的顺利解决。推动了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使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逐步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正轨。

总之，这是一场事关党的思想路线，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大讨论。是我党历史上继延安整风运动以后，又一次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

六十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主要内容和伟大意义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一）全会的主要内容

1. 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全会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即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一致认为只有全党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移，才能正确解决党的历史上的遗留问题，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会议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指出唯心主义的“凡是论”是维护过去“左”倾错误的思想武器，必须彻底抛弃。

会议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认为这个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会议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这个方针的提出和贯彻，是我党恢复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的正确体现。有了这个根本性的转变，党就能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从根本上纠正过去的“左”倾错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团结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2. 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会议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回顾了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决定基本结束揭批“四人帮”群众运动，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确定从一九七九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中央采取这一重大决策，是对长期以来党的“左”倾错误的纠正，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大步骤。会议指出，我国现在还存在着极少数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决不能放松对他们的斗争。但是，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

性质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会议强调指出，今后只要不是大规模外敌入侵，决不能轻易离开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会议明确提出党在新时期政治路线的基本内容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全会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和对新时期总任务的规定，标志着党在政治路线方面已经从根本上纠正了过去的“左”倾错误，牢固地转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

3. 全会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制定了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会议讨论了一九七九、一九八〇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和尽快把农业搞上去的问题。会议指出，必须纠正不从国力实际情况出发一味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认真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会议认为制定经济计划应该坚持既有雄心壮志，又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方针。为了尽快把农业搞上去，全会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会议着重指出，只有全面落实党的农业政策，把农村经济繁荣起来，才能更好地推动我国农业的现代化。

4. 全会着重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大批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会议认真讨论和解决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

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会议按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决定撤销中央发出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进一步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使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向前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搞好“四化”起了重大作用。

全会鉴于过去对于健全社会主义民主生活重视不够，因而造成“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的历史教训，强调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充分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保障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5. 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路线。会议决定，在组织上健全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反对个人崇拜，少宣传个人，强调了党中央和各级党委加强集体领导。全会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选举陈云为党中央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还选举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议作出的这些重大决定，表明党的组织路线发生了转变。

（二）全会的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的功绩，就在于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

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结束了两年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使党的事业全面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从各个方面深入总结历史经验，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并且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六十五、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 的主要内容和伟大意义

为了全面总结历史经验，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继续坚持和贯彻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党于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六中全会。

（一）全会的主要内容

1、审议和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决议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个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纲领性的文献。

（1）《决议》把确立和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作为根本的指导思想。《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为我们党和国家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的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和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

业、人类进步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决议》实事求是的评价了毛泽东的功和过，指出“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

《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基本内容作了充分的论述，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作出了更加严密的科学的解释，并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号召全党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并使之与新时期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保证党的事业沿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2）《决议》全面地、正确地总结了建国三十二年来的成就与曲折。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最大成就的历史”。尤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决议》对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与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客观原因。

（3）《决议》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指出，这条道路的主要点可以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到基本的总结，并对这条道路的主要点作了精辟的分析，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这个《决议》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同心同德的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将起巨大的作用。

2、改选和增选了中央主要领导成员。全会鉴于粉碎“四人帮”后头两年中华国铎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左”的错误，一致同意华国铎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请求。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华国铎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全会决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他们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铎。这次中央主要领导成员的改选和增选，对加强中央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集体领导和团结一致，保证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充分实现，将起重要的作用。

（二）全会的意义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又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是总结经验，团结前进的会议。这次会议生动地表明了我们党的坚强团结，充分反映了我们事业的兴旺发达。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这次会议将以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而载入史册。

六十六、《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基本内容及其伟大指导作用是怎样阐述的？

（一）毛泽东思想定义

《决议》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主要的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关于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

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

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党的一代又一代的领导者 and 大批干部，教育了全国各族人民。

毛泽东的重要著作，虽然有许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写的，但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因为（1）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2）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说过的话都是不可改变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作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

六十七、《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适合我国情况的现代化建设道路的主要内容是怎样阐述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的基本内容是：（一）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渐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四）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社会生活上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和进行有效的斗争。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正确地加以解决。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团结一切可以

团结的力量，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五)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

(六)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七)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八)在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国际条件下，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并使之同国家的经济建设相适应。(九)在对外关系上，坚持反帝反霸，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十)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其重要措施是：(1)一定要树立党必须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德才兼备的领袖们实行集体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2)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坚持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3)执政党的作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克服官僚主义，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和不正之风，整顿党的组织，纯洁党的队伍。(4)党对国家事务和各项工作的领导中，必须处理好同其他组织的关系，从各方面保证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各种经济文化组织有效地行使自己的职权。(5)党要加强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在国家事务的重大问题上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认真协商，尊重他们和各方面专家的意见。(6)党的各级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附 录

【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是在我们党取得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的情况下召开的。出席代表一千五百一十名，代表三千五百多万党员。华国锋主持了大会，并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政治报告，叶剑英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和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大会选出了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二百零一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三十二人。八月十九日，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

党的十一大，在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总结了同“四人帮”的斗争，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是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没有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因而党的十一大未能完成从理论到指导方针上根本拨乱反正的任务。邓小平在闭幕词中，强调我们一定要恢

复和发扬毛泽东为我们树立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努力奋斗。

【四项基本原则】 一九七九年一月至四月，中央和省市两级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三月三十日，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有针对性地着重阐述了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在摆脱“左”的错误影响的同时，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一九七九年四月，党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着重研究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会议强调指出，各经济部门之间存在着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为此，会议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坚决纠正前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失误，认真清理过去这方面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影响。会议指出，在贯彻八字方针中，调整是关键，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调整国民经济，把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基本上改变过来。在调整的基础上，着手经济体制的改革，继续进行现有企业的整顿，实行多种管理形式和多种经济成分，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企业管理民主化，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实行计划指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把整个经济工作的水平大大提高一步。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四个方面的任务相互联系，互相促进，边调整边前进，在调整中改革，在调整中整顿，在调整中提高。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是一个保证我国现代化事业真正能够脚踏实地地向前发展所必须采取的完全积极的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和执行，标志着党在经济工作中的指导思想，已经摆脱了“左”倾错误的束缚，开始了根本性的转变。

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 新局面的时期

六十八、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 大会的伟大功绩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至十一日在北京隆重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正式代表一千五百四十五名，候补代表一百四十五名，代表三千九百万党员。

大会的伟大功绩是：

（一）提出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

胡耀邦在报告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新时期总任务的核心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是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物质基础。同时，党又提出了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社会主义民主的任务。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是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条战略方针，而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又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保证。总任务本身，体现了正确处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这个总任务也就是党的总路线，一切工作围绕实现这个总路线、总任务进行，就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就有了正确的方向。

根据总任务的要求，从当前实际出发，必须抓紧四项工作：（1）继续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2）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使物质文明的建设获得巨大的推动力，使物质文明建设永远保持正确的方向。（3）坚决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4）在认真学习新党章的基础上，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保证。根据总任务的要求，在今后五年内争取实现三个根本好转，即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

（二）胡耀邦在十二大的报告，为党和人民确立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正确纲领

主要内容有：

1. 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高涨。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艰巨任务中，首要任务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

十二大从我国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提出了今后二十年

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以及基本方针原则。(1) 战略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总产值翻两番，即由一九八〇年的七千一百亿元增至二〇〇〇年二万八千亿元左右；(2) 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是要解决好农业问题，能源、交通问题和教育、科学问题；(3) 实现二十年的奋斗目标在战略部署上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

报告明确提出了经济建设要注意解决以下四个重大原则问题：(1) 关于集中资金进行重点建设和继续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2) 关于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问题；(3) 关于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的问题；(4) 关于坚持自力更生和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问题。

2. 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我们党的一项根本战略。十二大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意义和作用，提到理论高度和政治高度，作了充分阐述。指出，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社会主义社会是向着未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目标不断前进的，这个进程不能仅仅依靠物质财富的增长，还必须依靠人们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不断提高和革命精神的不断发扬。如果忽视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现代化建设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方向，

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失去理想和目标，失去精神的动力和战斗的意志，就不能抵制各种腐化因素的侵袭，甚至会走上畸形发展和变质的邪路。因此，能否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的大问题。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大体可以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这两个方面，这两方面又是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全党的任务，是各条战线的共同任务，一定要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搞好。

3. 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不仅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保证和支持，它本身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同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十二大要求，把社会主义民主扩展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人民更好地行使民主管理国家以及各项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生活的权利。

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中，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现阶段的阶级斗争。十二大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我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大多数不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现在还有形形色色的敌对分子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进行破坏活动。我国现阶段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人民同这些敌对分子的斗争。阶级斗争还将在我国社会的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并且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因此，必

须作好长期斗争的精神准备，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不存在的观点。

4. 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十二大指出，我们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出发点是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依据这个根本出发点，报告从国家关系和党的关系两个方面，具体地论述我们对外关系中的一系列重要政策原则。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是：（一）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关系；（二）坚决反对霸权主义；（三）坚持同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我国对外政策的重点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处理我党同各国共产党的关系，十二大确定了要“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这四点是我党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关系的重要原则。

5. 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为了搞好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在党的建设上当前要着重解决好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改革领导机构和干部制度，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以及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整党等问题，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不断提高党的战斗力，使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能够担负起历史的重任。

（三）大会通过了新党章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特点和需要，在总结执政党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十二大制定了新党章。这个

新党章，清除了十一大党章中“左”的错误，继承和发展了七大和八大党章的优点。它是党的历史经验和全党智慧的结晶。新党章对党员和党员干部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对党的民主集中制、组织体制、纪律、基层建设等方面作了许多新的规定，比党的历史上所有党章都更加充实和完备，它是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强大武器。

（四）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大会经过充分酝酿和民主选举，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同时选出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一大批德才兼备、比较年轻的党员担负了中央领导工作，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退出第一线，在党的最高领导层实现了新老结合与交替。党中央领导机构的改选，保证了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保证了党和国家政权掌握在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使十二大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有了组织上的重要保证。

总之，十二大的功绩是伟大的，它将作为在政治上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和纲领，在组织上实现新老合作和交替，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大会而载入党的史册。

附 录

【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一、十二日，党在北京召开了十二届二中全会。到会的中央委员二百零一人，中央候补委员一百三十六人。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成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经过认真的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这个决定体现了党的十二大的精神，明确规定了这次整党的基本方针、基本任务、基本政策和基本方法。全会认为，这个决定的贯彻执行，必将保证整党工作正确地顺利地进行。

为了保证整党工作的日常领导，会议经过充分酝酿，选举产生了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

会上，邓小平、陈云就整党问题分别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了清除精神污染，加强思想战线工作的问题。

全会要求全体党员，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积极参加整党，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